

編主會究研題問會社國中

中國社會

期三

卷四第

目要期本

- 抗戰中諸問題的總檢討..... 羅敦偉
- 我們的外交路線..... 李立俠
- 最近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羅承烈
- 戰時行政的再檢討..... 曹立瀛
- 抗戰與官僚政治..... 孫嘯鳳
- 一切都沒宣傳到鄉下去..... 張銀冰
- 抗敵新聞與新聞標題..... 張友鸞
- 閒話長沙..... 少青
- 四川的沉悶與怒吼..... 少青
- 戰爭氣氛的武漢..... 丹巴
- 淪陷後的上海素描..... 王吉文
- 由藝文社寫到文陣..... 王吉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中國統制經濟論

長沙中央日報
發行課代售

(再版)

羅敦偉著

實價一元六角

著者曾擔任國立大學經濟學講座並主編「中國經濟年鑑」，故本書不僅對各國統制經濟理論及動向有比較的研究。而對於我國各種統制經濟問題，無不根據實際材料為具體的解答及方案之提供。書分上下兩篇，一二十五萬言，精印一巨冊。內容要點如下：

一、統制經濟的基礎理論。二、世界統制經濟之現況與動向。(內分國家的，國際的，及集團的)三、統制經濟構造的特質(由本質的分析決定為一變質的封建經濟)四、中國統制經濟的必然性。五、中國統制經濟懷疑論之檢討。(辨證法的展開)六、中國經濟政策。(並比較研究各種經濟學本部型式，而獨創中國的新型)七、中國統制進程序。(包括資本及技術問題)八、農村統制。九、棉紗業統制。十、鋼鐵銅及石油之統制。十一、煤之統制。十二、機械工業。十三、鐵道統制。十四、國營貿易。十五、滙兌管理。上海新生命書局印行

非常時期經濟政策

為新著之一，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全書九萬字，定價四角五分

我們的社會

係著者新著，約十萬言，南京正中書局印行，定價四角五分。

中國統制經濟問題

內容充實，定價一角五分南京中央日報發行課代售。

現代民治的趨勢

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定價七角。此書對民治主義作歷史的檢討。

現代國家學

此書為著者在國立北平大學教授時之講義所改編(定價一元)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家庭問題

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定價四角，此書係與易家鉞先生合著。

中國婚姻問題

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定價四角五分，此書係用社會學者的眼光，對中國各種婚姻問題，作詳細的檢討。

中國經濟建設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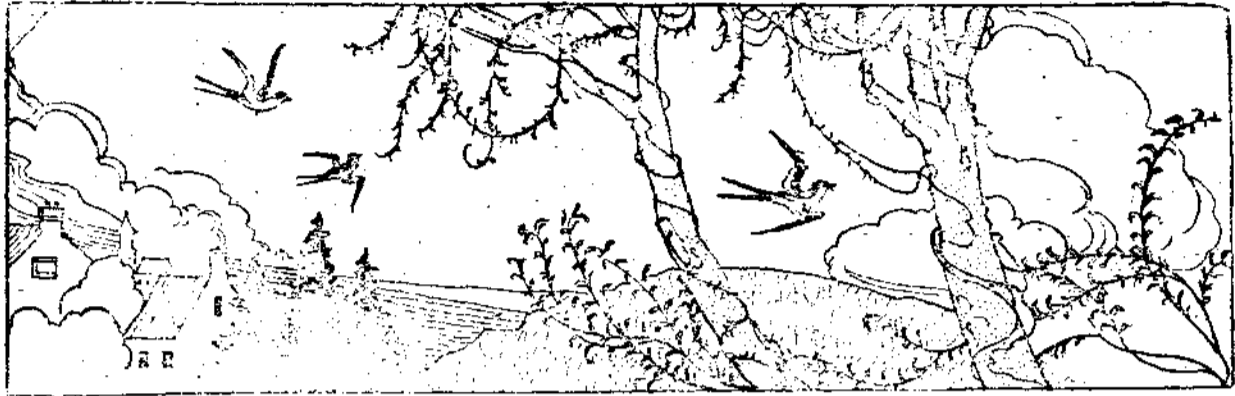
此書為討論中國經濟建設問題之論文定價一角上海大公報代辦部代售。

社會主義政治學

此書對社會主義各種政治理論，如國家論，政府論，政黨論，階級論，均有客觀的比較研究。定價一元二角特價六角上海大公報代辦部代售。

注意 此外著者著作尚多，目繁不及備載

其他著作



中國社會

第四卷
第三期

本誌特別啓事

本誌第四卷第三期，本應於一月十五日出版，惟因本會由京移渝，同人又因職務關係，行止不定，致無法集稿，祇好移下一期，改於四月十五日出版，各訂戶均按期補足，又因紙張飛漲，印工昂貴，略將篇幅減少，仍不敷成本甚巨，尚希閱者原諒！

戰時特刊目次

抗戰中諸政治問題的總檢討

羅敦偉（一）

內容

- 一、民主與反民主
- 二、統制與反統制
- 三、自由與解放
- 四、官僚政治與抗戰政治
- 五、民族第一主義與新鈔血主義

我們的外交路線

李立俠（九）



最近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羅承烈（一三）

戰時行政的再檢討……………曹立瀛（一七）

抗戰與官僚政治……………孫嘯鳳（二三）

一切都沒有宣傳到鄉下去……………張恨水（二七）

抗敵新聞及新聞標題……………張友鸞（二九）

閒話長沙……………少青（三一）

四川的沉悶與怒吼……………少青（三一）

戰爭氣氛中的武漢……………丹巴（三三）

淪陷後的上海素描……………王玉（三三）

由藝文社寫到文陣……………王吉文（三四）

真寫會社

抗戰中諸政治問題的總檢討

羅敦偉

- 一 民主與反民主 民主政治之兩型——三民主義民主政治——戰爭期中的民主問題——權與能的認識
- 二 統制與反統制 統制政策——偉大意義——毛澤東之統制政策觀——統制政策之正確路線
- 三 自由與解放 戰爭中的自由問題——解放的正確認識
- 四 官僚政治與抗戰政治 政治——構之再組織——官僚主義與官僚主義——強化政治之基本方法
- 五 民族主義與新錢血主義 抗戰基本力量——日本人口中之御用理論——抗戰前途的總歸趨

一 民主與反民主

社會主義是為民主自由而鬥爭，三民主義也是為民主自由而戰爭，什麼人敢反對民主主義呢？我們在抗戰期間，因為要得到民主集團國家的同情，更不能夠有反民主運動的主張。所以反民主主義這個態度，除開法西斯主義者以外，在理論上似乎不會有第二種人們。而且我們正要準備達到民主政治。

話雖如此，在今日的中國，尤其在抗戰期中的中國，理論上雖然絕對不能反民主主義，而事實上『照普通的方式』作民主運動，是否已經到了相當的時期，以及能否增強抗戰的力量，却實實在在成爲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民主主義定義雖然研究民主政治，專家伯茨的解釋有各種各樣，可是除開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外，在本質上區別起來却只有兩種型態：

一、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即是以社會大衆平等自由爲目的的民主政治，又可以名之爲階級的民主主義。列寧

對此曾有詳細的說明，刻下蘇聯所實施的，和這個很相近。

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 這個是十九世紀風靡一時的民主政治。名義上雖然是以爭取社會大衆的平等自由爲目的，事實上却祇是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這個民主政治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而以擁護資本主義爲歸宿的。

三民主義所要爭取的當然不是後一種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不僅如××先生所說的，『……應從國民大會選舉與召集上違反民主辦法改變爲民主的選舉與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民主政府，執行真正民主政策爲止』。而且我們以爲依照唯物辯證法的解釋，非先做到基礎的改造，上層建築物的政治制度，不會能夠改造的。這個我想每一個三民主義的真實信徒，固然明白，而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更應該明白。在抗戰進行中間，這個嚴重的階段，除開共同抗日以外，什麼

也就談不到。民主政治，似乎有他應具備的條件，一定要有他確切不能少的經濟基礎。當前的中國，慢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無從說起，即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也一樣說不上。假定我們一定要馬上做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在理論上我們不僅不反對，而且同樣地熱情地期待着，可是事實上沒有經濟的基礎而去空空期待上層建築物，實在是陷入了『觀念論』的窠臼，而不會有結果的！

但是『緣木求魚，豈不得魚無後災』。而在抗戰期中一定要提倡太理想的民主運動。彷彿激進的民主主義，應該在戰時的實現。而政府又做不到，因此使一般社會大眾對領導抗戰的政府發生各種各樣的反感。本來這次抗戰以來，最大的缺點，誠如毛先生所說『沒有做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尤其是軍民不僅沒有一致，許多地方的軍民甚至還相反。在抗日陣綫上『背道而馳』。再甚一點說，反而『敵我一致』，老百姓與敵人一致起來，甘心去做敵人的漢奸。這種現象的存在，固然要用有效的方法加以改變。可是他是高唱做不到民主運動，至少對於這個現象沒有好處。而許多鬆懈的統一陣綫，更有因此脫節的危險。

事實為最大之難題。再就事實方面說，如果在抗戰期間展開民主運動，事實上困難可以說無以復加。祇就民主的選舉說吧。炮火連天之下，固然沒有方法選舉，飛機轟炸之下，選舉也很困難。即是後方各省區，因為前方的供應，後方的穩定，壯丁的訓練……事實也沒有閒空的工夫去應付選舉。民主運動的最初一步，即沒有方法實現。並且所謂民主集中，一定要先有民主的可能性，才能談到集中；訓政沒有施行，三民主

義的忠實信徒，不能談民主。地方的蘇維埃沒有推立，共產主義信徒也不應該談民主。蘇聯的領袖們，如列寧，如斯達林，乃至盧波爾都一致攻擊虛偽的民主政治，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而我們難道反而想替地方封建餘孽來趁火打劫，利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造成封建民主，官僚的民主集中嗎！恕我再说一句，事實為最大之難題，中國，尤其是在抗戰期中中國，不能一步登天實現民主，種種事實都擺在我們面前。中山先生和列寧先生的確偉大。中山先生以為革命必須經過一定的階級，而且他對自由平等而奮鬥，可是懂得奮鬥的方法，認為非經過訓政時期，決不能行民主制度。列寧也有同樣的認識，以為沒有充實社會主義物質條件之先，沒有方法實行社會主義。尤其在帝國主義環攻蘇聯的時候，實行黨專政，實行黨領袖對黨，有其必要。而斯達林先生也一樣偉大，他在五年計劃實行之先，不展開民主鬥爭，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也不展開民主鬥爭，直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國內的資本主義成分完全消滅，舉國一致，社會主義相當成就了，才提出制定民主憲法，（雖然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及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均公布過）召集民主國會，選舉民主政府，執行民主政策，然而因為國際環境的關係，還不能道地的『真正』民主事實上當然比盧波爾所說在隱蔽形式之下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已經真正得不可以道里計了。當然哪，每個唯物辯證法的理解者，決不肯抹殺事實去空想，也不會由主觀上造成一個空中樓閣，匆忙地去鋪到紙上。蘇聯這些困苦奮鬥的經驗，大可以作我們的參考。

其實，也不僅蘇聯如此。即如英美各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一到戰爭期中，也都是暫時放棄民主主義，而代以戰時統制

主義。歐洲大戰時代的經驗即是鐵證。事實太明白了，用不着再去詳細說明。我想，決不會有人忍心再去說不負責任的風涼話：『正因爲中國過去沒有民主政治，不妨在危險時期未趁火打劫玩耍一下吧！』

近來有人說道，也許主張民主運動的人們，並不是說真正的民主主義。既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也不是指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而是指國民黨應該公開治權。把各方面有『能』的人們，都請進來，共同負責。假定是如此說的話，本來即不是民主運動，正可以不必牽扯到民主與不民主上面，而應直截了當的談公開政權問題。公開政權，原則上本來不必反對，事實上也沒有人反對。大家現在已經承認在三民主義之下奮鬥，大家現在已經公認三民主義爲唯一救國主義。公開政權，也不成爲問題。刻下各方面有『能』的人們，已經都直接間接參加了政權。不是在軍事上負那一方面責任，即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參加一部份的工作。少數人或者對於本身地位不滿意或者對於政治現況不滿意，這個事實的存在到處都有，更是另外一個問題，與民主問題，相差更遠。所以我以爲大家與其高談民主運動，不如切切實實來研究如何才能使真正有能的人們，能充分地能力貢獻國家。而同時切切實實研究如何打倒一部份自私自利假公濟私的官僚，而使每一個政治機構真正能發揮他的最大效能，爲抗戰切切實實工作。爲實現三民主義民主的準備。展開真正的民主運動。

二 統制與反統制

『統制，統制』，我已經提倡過好幾年了。又明明白白是一種加強抗戰力量的唯一政策。可是至今不僅沒有人實行過，而且還有許多反對統制的聲浪。但是不幸得很，反對統制的人

們，不是由於自身的利害關係與統制相反，即是誤解了統制的意義。過去且不論，例如最近不久以前方撤消的××統制委員會，差不多完全由本身企業家組織而成。他們目前的臨時利益，在戰時的暴利，這個當然是人之常情，有機會沒有不想獲暴利的企業家，他們當然反對統制，可是當上了一塊統制的招牌，以此正爲拒絕統制的利器。但是因爲他們產業本身上原來是一種極脆弱的組織，結果還是許多人喫了不統制的大虧，而真能應到戰時暴利，不過其間的極少數人。還有許多人把個人或者極小的集體利益看得太重，手下真正能做來的人又極少，同時又想對於某些事情去包辦。長忠厚的解釋，也不過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在社會上可以獲得榮譽的專業。但是個人事業，或各方面開辦自私自利的人們的反對，而致百事無成，或者原上包而下陷。毛澤東先生所謂『占領茅坑不享用，全國人民爲得兒子養父又沒有茅坑』，這個矛盾即是由此而來，因此，有許多人認爲即是由於統制之結果，把這個過罪，寫到統制之賬上。毛澤東先生即是這樣看法，所以他說：『誰也明白，統制，統制，是與蘇聯是相類似的』。他並且認爲這套統制政策，是十年來的一套。現在不是十年來的一套，是不不是不應起民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我連辯護的資格也沒有，可是認爲已經實行過統制政策，甚至咬定統制與喚起民衆相違背，這個却不能不爲統制辯屈。

誰明白，統制與喚起民衆相違背？即必需的鎮壓也和喚起民衆，並不相反。蘇聯即是最好的例子。蘇聯如果不實行統制，不去鎮壓一切反動，他們不僅不會有今日的成功，恐怕早已連中國還不如。這個事實太明白，祇要稍稍懂得一點點蘇聯事實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的。蘇聯不僅初建國的時候，對於統制

和鎮壓做過絕大的努力，一直到目前，也還天天在統制，天天在鎮壓。固然，鎮壓濫用起來，有他的流弊，也大可以與喚起民衆相違背。甚至可以作為專制魔王，壓迫民衆的法寶。可是却並不是本質上如此，正好像糧食喫得太太多，也許會和養生之道相違背。但是却不能夠說喫飯與養生之道相違背。至於統制，則絕不會和喚起民衆相反。這個祇要懂得統制的人們，『誰也明白』。

統制是什麼？蔣委員長解釋是『系統分明，體制嚴整』。我在拙著『中國統制經濟問題』上面對於統制經濟，曾下過一個比較詳細的定義：『統制經濟是在中央意志之下在經濟過程上求生產與消費之均衡發展一個經濟建設程序。』與上述的統制意義互相比照，即可以了解所謂統制，絕不是鎮壓，也不是嚴格的管理，更不是『佔領茅坑不享用』的包辦。而是系統分明，體制嚴整一種的組織力量，而系統既分明，必是由上而下，一絲不亂。體制嚴整，必然的是組織明白，行動光明，而他的目的必然在求大眾福利的均衡發展，同時把大眾力量集中起來，系統化，組織化，使大眾力量不致互相對立，不致互相抵觸，不致互相矛盾，正是要打倒佔領茅坑不享用的矛盾，也正是要使人人不致肚皮脹破而得不到茅坑。而且更進一步，使人人不僅有茅坑，並且同時舒服增加他們衛生條件，增強他們組織力量，發揮他們的最高能力，得到他們的能力運用上最大效用。當然，有時也許會和鎮壓聯系起來，比如有人要佔領茅坑不享用，或者有人更在茅坑裏拆爛污。乃至有人企圖顛覆政權，搗亂民族國家的自存力量。當然在必然鎮壓之列。話又說回來，蘇聯十多年來的那一套，即是我們的好榜樣。蘇聯，現在還是十年來那一套。天天在鎮壓，天天在統制。我們

倒不必一定要求今年不照去年，也不一定死板板地反對十年來的一套。我們是反對十年來並沒有統制，更只空口去喚起民衆。而沒有用統制方法去喚起民衆。民國十五六年民衆喚起來了。可是因為沒有做到系統分明，體制嚴整的統制，因此，民衆雖然喚了起來，又是沒有指導民衆去做真正革命的工作。更沒有想到類似五年計劃的建設運動。自然更不會想到社會主義的競賽。也同樣不會有斯塔哈洛夫之類運動。大家都不真正了解馬克斯主義，大家更沒有領教唯物辯證法。大家更沒有了解列寧主義。假定有人了解列寧所謂：『沒有充實實現社會主義物質條件之先，不能實行社會主義』。指導大眾能夠自經濟基礎上謀三民主義的建設，（即謀共產主義的建設也可以）那末，何致使大家『努力』同歸於盡。使革命者多數背叛了革命。現在大家正要深切認識，而且要沉痛的認識，過去的失敗，原因雖然非常之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大家只了解了總理遺囑『喚起民衆』的一句，而沒有看下文『共同奮鬥』。因此，既不系統分明，也不體制嚴整。只知各自鬥爭，把朋友當做敵人。在自己國內找搗亂，天天破壞系統分明，天天反對體制嚴整。把經濟的基礎，客觀環境，物質條件一致別開不管。而專憑主觀去高唱什麼主義，什麼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民生史觀，唯物史觀，一律置之度外。幸而有我們偉大勇敢的領袖，終日辛勞，艱苦奮鬥，才有今日的力量。否則，國家真正不知道更紛亂到什麼地步。雖然如此，究竟因為種種的關係並沒有做到系統分明，也沒有做到體制嚴整，換句話，即是沒有做到統制。大家假定到現在還是十年來的那一套，再不去求系統分明，體制嚴整的共同奮鬥。喚起民衆去真正共同奮鬥。把民衆的力量與政治力量打成一片。『官兵一致，兵民一

致』，那末，『前綫的危機真的不會減少，而只會加大。』

因此，我們要認定統制主義是加強抗戰力量最大效用的政策。而同時更知道，喚起民衆雖然不一定需要統制。但是要喚起民衆而做到『共同奮鬥』的目的，則必須系統分明，體制嚴整的統制。不然，既不能共同，也更不能奮鬥。充其量也不過是十年來的一套，祇有分散的互鬥罷了。

最後，我還得聲明一句，即是我之所謂統制，決不是一般人所謂統制政策，更不是借此排除異己的一種手段，而是真正系統分明，體制嚴整的一種政策，在系統分明。體制嚴整之下，求人，才、物力的總集中，總動力，發揮我們地大，物博，人衆的威力，把握我們的抗戰勝利，把握我們的民族復興。

三 自由與組織

『自由，自由，』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成爲了一個政治鬥爭的呼聲。可是至今還成爲一種政治鬥爭的口號。何以政治鬥爭成功過若干次，而自由主義却從來沒有宣告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自由，本來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根本即不容易有一致見解的自由。

同樣，最近中國抗戰期中，又有爭取自由口號的提出。正因爲自由這個名詞太廣泛，解釋上又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所以雖然沒有人反對自由，可是在爭自由的人們看來，總覺得有人在反對自由，甚且感到有一種極大的勢力，壓迫人們，致一般大衆不能自由，因而對於這個問題，至少生出兩種不同的態度。

有一種人以爲大家本來爲爭自由平等。在抗戰期間，尤其應該解放大衆，使大衆自由說話，自由思想，自由組織，充份

發揮大衆的力量，強化抗日陣線。

有一種人以爲抗戰最主要的在有組織的行動，有由上而下的指導，不能使人們隨便自由。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種種自由，都應該受相當的限制，甚至還有人主張嚴格的限制。

這兩種態度，都是以加強抗日陣線爲目標的，在本質上沒有可以非議的地方。可是兩種態度既然不同，那末，以那一種態度最合強化抗日陣線呢？所以有拿來互相比較的必要。

在主張爭取個人自由，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乃至自由組織，自由武裝的人們看來如果自由爭取不能達到目的。『就不能動員人民加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收復失地的勝利。』我個人對於爭取個人自由，這個原則，並不反對。不過大家應該認識當前的危機，不是個人自由問題。而是整個民族自由問題，乃是中華整個民族最危險的時期。中華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期。——這是我們最前提的認識。假定我們能夠一方面爭取國內的政治自由，而同時不妨礙爭取民族自由的抗戰，那末，我們當然同情，而且要共同努力於爭取民衆政治自由的運動。可是常識告訴我們，在戰爭期間，在全國總動員的期間，不僅每一個人應該極度犧牲他個人的自由，站在絕對的國家軍事統制之下，即是一草一木也得受軍事的統制，與軍事配合，共同作對外的抗戰。高唱自由平等的國家，如英，美，法各國，他們在歐洲大戰的期間，莫不是放棄個人平日已經得到的政治上的若干自由，而加入協同一致的軍事組織之下，受軍事統帥的指揮，英勇地對敵人抗鬥。共產黨員當然也以爭取自由爲目的，可是蘇聯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公布第一次憲法的時候，那部憲法裏面滿藏着內爭外戰的痕跡，『因此，那部憲法』是一篇挑戰的文字，一部階級鬥爭的經典，一個獨裁

政治的標幟，一張壓迫反動派的文告，一副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工具」(Joseph Barthelmy-La Nouvelle Constitution Soviétique)當然沒有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第二公布的憲法中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條，規定了國家政治偵探局(Guepeou)種種可以妨礙人民個人自由的特權。政府並先後頒布命令，規定政治偵探局種種的如放逐權等等權威。至於這個局的偵探之自由可以入人民的家宅，自由拆閱個人的書信等等，更是太平常的事，就是最近公布的斯達林憲法，雖然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運動種種權利。可是仍然以「為維護勞工利益，和擴大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為前提，而且特別反對「罷工權」，認為同盟罷工為全國的公敵，應處以死刑。然而共產黨的同志，不僅沒有反對過蘇聯政府的措置，而且始終是擁護政府因時制宜的政策。固然，蘇聯賢明的政府行動，我們並不可以一概而論。可是足以證明，凡有政治組織的地方，決不能有無限度的自由。而在一個國家對外或對內基本政治組織發生危險的時候，人民自由必然的會縮到最小的限度。因此，我們敢說，中國人民應該以爭取自由平等為目標，可是在民族整個自由發生危險的時候，却應該把個人自由縮到最小限度。絕對的不能夠以爭取個人自由為抗日的交換條件，而反過來到應該以放棄自由，共同抗日為態度的。

至於說到「自由組織」，「自由武裝」，有許多人以為乃是抗日民族鬥爭中的天經地義。我個人則以為民衆自由組織起來，甚至自由武裝自衛起來，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決沒有反對的道理。可是我們必加強這個民衆組織和民衆武裝的力量，同時又要防止一切流弊，那末，我們覺得這個「自由」也有檢討的必要。我們知道，組織愈大，愈有系統，力量也越大，武裝，

更是愈有組織，愈有統一的指揮，也才能加強力量。例如毛澤東先生在赤區時代，雖然極力提倡民衆運動，更極力主張分散的游擊戰術。可是毛先生却仍然支持統一的蘇維埃政府和有體系的赤軍及中共。即對遠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也絕對服從。可見最民衆化的組織，最分散化的武裝，也同時是最有分明的系統，嚴整的體制的。日下的抗戰，比較任何戰爭都嚴重，自然也更需要系統分明，體制嚴整。所以民衆儘管可以自由武裝，自由組織。可是一經武裝起來，一經組織起來，即應該在中央政府之下，最高統帥之下，受嚴格的訓練，受嚴格的指揮。維持抗戰的整個系統，支持抗戰的統一局面，發揮抗戰的集中力量。而同時避免步調參差，互相抵觸，甚至在互相鬥爭種種流弊。所以在自由組織與自由武裝的主張之下，並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而且這個自由是應該在系統分明，體制嚴整之下受國家統一的統制。

話雖如此。可是這個理解，是一種正常的理解，不可以被無聊的人們，因之作爲壓迫民衆，榨取民衆的工具。因此，我們要理解合理統制，決不是專制。必然的，需要系統分明，體制嚴整，才談得到統制，才談得到組織，才談得到武裝，也才談得到自由。武田鼎一說，自由主義是放恣的自由，即是不自由，統制主義是合理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這幾句說，值得我們注意。

四 官僚政治與抗戰政治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政治不良。固然近年來在中央領導之下，許多機關，許多地方政府，已經有了新的進步，可是中國政治的不良，官場的腐敗，差不多是千百年的積習，人心易改

習俗難移，何況是歷久的根深蒂固的積習，一下把他完全去掉，當然非常困難。在平常時候，中國的官場，最主要的態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定要有成案』『照案辦理』。『查案辦理』。所以政治上的改革，不容易除惡務盡，不容易用革命的手段來改革政治，現在到了這個大時代，而且政治的清明，與加強抗戰的力量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於政治的改革，似乎不應該再用因循苟且的方法，去談改革，而應該澈底的去工作。換句話，即應該將政治機關再組織，政治人員再編制。

依最近的事例，政治機構的調整，每每僅及於人事的換湯不換藥。或者調動幾個無關重要的舊人，或者升遷幾個自長官看來有重要的人物。在工作方面，因為人事上的糾紛，已經把一個長官弄得頭昏眼花，再加上各方面所感到的困難。差不多使工作效能極度低減，甚至比原來的還不如。有人說仍不脫『官僚主義與飯碗主義』。真的，仍然充滿着官僚的舊積習，也仍然還是在公務人員的『運氣』問題。國家的，抗戰的打算太少，而個人利害的計算太多。如此的政治改革，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中央機構的改革，既然如此困難。地方政府自然更困難，至少加倍。最近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先生，銳意改革。今天報上有一篇通訊，說李先生與某縣紳立談之下，即委之任縣長，又說縣地方有民衆武裝同志四人來見，說該縣政治不好。李先生即叫他們推舉縣長。又說實行充實民衆動員委員會。這幾個辦法，令我注意。還是充實民衆動員委員會一點。至於立委縣長，公推縣長，態度固然十分公開，辦法却不一定妥當。老是如此做，必會使狡黠之流，可以大售特售他們的好計。由

此，我們可以知道改革政治，尤其是地方政治，決不是一個簡單勞作。

政治的改革，千頭萬緒，真的討論也不容易詳細。我現在想提供幾個最基本的方法：

第一，【系統分明，體制嚴整】行政效率之提高，必須系統分明。決不可以一個事能，這個機關可以管理，那個機關也可以管理。一個機關，既要受這個機關的直接指揮，又要受那個機關的指揮命令，天天接到上峰一些辦不到的命令，弄來弄去，自然這個機構也就麻木起來。那裏有行政的效率。體制方面，自然更不需要嚴密。不可以各自分散。因人設事，把一件事能分到幾個機關去管理。例如我過去曾經擔任過全國實業統計的主管任務。可是不僅各省辦理實業統計的機關，我管不着即同在實業部範圍以內各機構所辦的實業統計，我們也很不容易取得聯絡。這個不過是系統不明，體制不嚴整的一個小例。此外大的方面，系統不明，體制不嚴整的地方還多得很。例如鋼鐵廠，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最主要的中心工業，當然急於需要設置。而因為中國可以主辦這個廠的政治機構太多。在不能辦的時候，互相推諉，一日到了能辦的時候，大家又搶着要辦。結果，計劃草成了好幾年，依然是白紙黑字。這個又是一個小的事例，此外大的事例還多。所以我以系統分明，體制嚴整是改革政治的第一個基本法則。

第二，【人盡其才，事盡其利】人盡其才，不容易，事盡其利，尤其不易。人如何才能盡其才，最主要的即是處理人事問題。科學化。事盡其利，也同樣需要工作的科學化。

過去中國處理人事問題，離開科學化的距離太遠。差不多都以個人利害為前提。最高明的也不過多用幾個『所識窮乏者』。

下馬者則不過用些貪贓枉法的朋友親戚。抗戰期間，雖然大家都叫着『大家貢獻能力』『有力的出力。』可是至少在政治方面，越有能力的公務員越感到沒有貢獻能力的機會。越有力的人們，越沒有機會出力。那里還談得到提高抗戰的政治效能。

知人之明，本來是一個不容易的事，也最不容易科學化，可是至少主持事權的人，應該『竭智盡能』去使用有用的人才，而且使人才得到適當的用途，最低限度也不可以專門任用私人，任用一些沒有能力的私人。『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在平日還可以馬馬夫夫，在今日抗戰期間，實在味盡天良，對國家不起。還有一點，即是人事上的『專家萬能主義。』專家，政治上當然需要專家。胡適之先生說過，用洋車夫開汽車的危險。但是現在有許多專家，却是大家認為萬能。一個化學有研究的人，當然祇對於化學有研究。不用去努力有關化學的工作，却今日請他去作秘書長，明日又請他去作參謀長，再過一下，又可以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財政行政長官。大家認為他萬能，他自己也以為是孫行者可以千變萬化。結果，事實上却早已一無所能了。即如一個有能力的醫生，加果用在國家醫院中間，主持診斷，當然有良好的貢獻，一旦請他去主持衛生行政，表面上似乎人盡其才，而實際上即是把這個高明醫生變為無用。久而久之，良醫也就作廢，這個對於國家是一個損失，對於個人也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所以政治上不僅應用專家，而且應該使專家用得其所。才能人盡其才。不過，此地要補充一句，即是我並不是說學化學的人，一定不可以作秘書長，假定他真有特別的訓練和特別的天才，也未常不可以。不過那不過是特別的例子，却不能認為每一個專家，都可以變通辦理。至於專家萬能主義，無論如何是需要改正的。

事盡其利，更為重要。每一件事態，都應該細心地處理，用個人的最大能力去處理，而一般公務人員，處理事態的方法，最高明的也不過形式主義，成案主義。每一件事務，祇要有成案可查的，沒有不是查案辦理，從來也不去看此刻的環境是否合適，自然更不肯去求進步的處理。前實業部長吳達鈺先生曾述及一個故事。他說，西安事變的時候，實業部的西北某農場，被某部軍隊駐紮，而且什物被強佔。該場主任照例呈報，辦稿的人，照例打一個電報給某軍長，請其令飭該部退出，將什物歸還。吳先生一看，有些不妥，因為把原電轉去，說人家強佔，結果必致使該師老羞成怒，反致不妥。如是將電文，改為臨時借用，請其歸還。當然可以得圓滿結果，這是一件極小的例子。可見什麼事情，無論大小，要處理妥當，必須用一點腦筋。照案辦理是不夠的。所以『事盡其利』，必須每一個公務人員，要天天求進步，天天研究，把一切事態，用科學的方法去求進步。

第三，『勿再治人專門治事』。過去政府，總自居於治人的機關，所以政府對於人民素來不講禮貌，小小一個縣政府或者社會局，對於人民的普通通知，信面上總是直書其名，固然沒有先生等稱呼，連一個『君』字也不肯寫，而內容上更是官話十足。人民的呈文，偶而錯了一個字，即行退還。領執照的時候，如果少繳了二分印花，一定不惜一再用掛號公文催取，所費的人力，郵票已十倍以上。而治事的精神，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怕在這樣抗戰的局面之下，政治也找不出什麼新設施。』請看人家，如德國的各部，如何緊張。經濟部天天拿着海關冊，在計算，在謀德國貿易的發展，生產之向上。如日本某次探得我國貨物在美國某地暢銷，立刻派員前往，聯絡華僑，

替日本搶奪市場。最近中日戰爭以來，推行的國家管理的新政，也已不少。不像我國，大家對於治事，總是不容易有勇氣，樹立新姿態，有時候，成立一個新機關，也不過是調動幾個人員。即是新政，也大半是掛羊頭賣狗肉，真正作事業的人，並不是沒有，但總是很少。所以政治上的改革，一定要趕快樹立專門治事的新精神。

以上檢討的，不過是當前改革政治的基本理解，此外應注的事態，當然非常之多，此地不必詳說。

五 民族第一主義與新鐵血主義

抗戰期間，無論什麼政治論理，我以為在理論上必然的應該和『民族第一主義』一致，即在行動上又必須是合乎『新鐵血主義』原則的，關於民族第一主義和新鐵血主義，我曾經寫過好幾篇文章。去年六七月前後，並且曾經引起日本論壇上的注意。誤認爲此乃中國第二期統一的基本動向。去年八月號外交時報上並有專論批判且斥我是『南京政府御用理論家』，其實所

我們的外交路線

一

外交本質上雖是代表國策，可是形態上外交與國策究有若干區別，國策是確定的，外交的運用則須隨時隨地視環境而變，軍事術語中有戰略與戰術兩個名詞，國策就是政治的戰略，外交只是戰術而已。

抗倭戰爭發生以後，我們的國策，只有一個，即澈底打倒

中國社會 第四卷 第三期 我們的外交路線

謂『民族第一主義』即是強化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認爲一切的一切，都應該以民族利益爲前提。即排斥一切與民族利益不相容的理論或者主義，造成真正『舉國一致』的精神。新鐵血主義與十八世紀的鐵血主義，完全不同並不是窮兵黷武主張，所謂『鐵』即是鐵心建設，物質建設，也即是國民經濟運動。所謂『血』，即是血心建設，心理建設，也即是新生活運動，不過是把他簡單化行動化，同時鬥爭化，使人們在行動上展開共同努力的物資建設，在意識上展開共同一致視死如歸爲民族國家集中流血的精魂，當然絕對的能夠犧牲個人的自由，拋棄個人的利益，而爲國家民族，共同建設，共同鬥爭。自然容易接受國家的統制。而造成『一個國家，一個命令，一個步驟，一個領袖』的行動了。所以我們檢討當前抗戰中間的政治理論，應該以『民族第一主義』和『新鐵血主義』爲基調，那末，決不會違反民族利益和鬥爭精神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完稿于重慶

李立俠

日本帝國主義，以這樣一個國策爲中心，我們的外交方針也不外爲如何集中力量以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可是因爲外交上作爲對象的國家太多，這些國家對於遠東問題的關心程度以及對於中日的關係，有着很大的差別，所以外交的運用也不能有深淺的不同。

就理想上講，我們的當前敵人只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除了日本帝國主義之外，都應該視爲友人並且希望從他們身上獲

得同情與援助，不過事實上絕沒有如此單純的國際關係，我們固然有我們外交的戰術，而敵人也有他的外交戰術，敵人無時不在希望從我們以外的國家獲得支持他的侵略政策。同盟者，使我們孤立無助。

在這種相互勾心鬥角的情勢之下，我們的外交政策不能分多方面進行，對於一向反對日本侵略政策及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必須十分努力獲得它們的援助，同時對於敵人的同盟者，也還要多方設法，使他們保持善意中立，如此外交政策，可以歸納為三條路線：

第一、聯合反對敵人侵略政策及愛好和平的英美法蘇等國

第二、通過國際聯盟以獲得其他民主國家道義上的援助。

第三、使敵人的同盟者願意兩國維持善意中立。

從抗戰發動以後，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是沿着上述三條路線進行，縱然政府方面並沒有發表過顯明外交政策，可是隨着時間的進展，我們在國際上的活動，確是沿着這三個方向。

在抗戰八個月之中，因為軍事上部份的失利，我們的外交政策也迭遭國內人士批評，這種批判是多方面的，而在初期特別有下列兩種傾向。

第一是左傾幼稚病者的論調，他們認為中國的敵人，不只是日本帝國主義，其他英美法等國，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都應該在同樣打倒之列，這種說法姑無論其理論根據如何，但首先就犯了忽視客觀事實的毛病。

目前中國的抗戰不只是一個被侵略國家對於侵略者的抵抗，同時還是為了維護正義及擁護世界和平，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告國民書中最後曾提到兩點：說我們抗戰的意義，一是為『民族生存而戰』二是為『維護國際和平正義而戰』為民

族生存獨立而戰，這是中國單獨的責任，但國際和平的保持與正義的維護，全世界正直的人士都負有責任，所以我們在這一次鬥爭中，我們必須要爭取國際上善意的支持，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實際援助。

過去有許多革命戰爭的成功，都是依靠運用國內力量與國際正義的力量結合。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當時德國軍隊在波爾斯公爵領導之下，曾公開發言譏諷整個法國，可是法國一方面號召市民保衛他們的國家，一方面取得英國等民主勢力的援助，終於擊敗了德國的軍隊。

同樣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也是依靠了國外民主勢力的支持才能成功的，一八四八年德國一個著名的外交宣言中曾說到他們所戰鬥，也是一方面為了民族生存，同時還是為了推翻中歐整個封建勢力，他們要求一切反封建勢力的人們起來援助，最後德國革命也終於成功了。

在目前世界情勢中，英美法蘇等國雖然是在維護國際和平而戰，姑無論其維護和平之目的如何，但是他們在既然而反對侵略國家，在現階段上我們就應該彼此攜手。

第二種錯誤是失敗主義者的論調，根本上不顧抗戰到底，而以爲要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求和，必須聯絡它的同盟者，同時又幻想到中國兩國間多年的友誼，德國也許會同情我們幫助我們，這種心理在南京陷落前後特別表現得利害，但是自從和議不成，而希特勒公開承認滿洲國以後，這些主張對德意親善的人們，才感覺着啞口無言了。

德意兩國本來是我們敵人的友人，我們希望敵人與朋友來幫助我們，當然不能十分圓滿。所以最近德意先後承認滿洲國及在各方面爲日本聲援，這在稍爲明白國際情勢的人，都已早在

意中，不過我們爲了削弱敵人的力量，並爲集中精力起見，對德意固不能有所期待，可是我們仍然要盡量設法使其維持表面的中立。或者多多少少的援助。

二

這兩個半月來，歐洲情勢是變動得太利害了，德國國防部長白倫堡去職後，希特勒消除了國內牽制力量，又放胆地向國外冒險，首先他就承認了日本現翼下的傀儡組織，現在更以武力吞併奧國，在中歐造成空前緊張形勢。

其次，英國外交部長艾登去職，引起國內各黨間最大的風波，和世界各國很大的震動，艾登是素來以護國際聯盟及集體安全制的，同時艾登之去職，又是爲了反對英意談判，所以由艾登之去職，似乎是表示英國放棄了集體安全制度，要求與德意妥協，在國際上另圖構成一種新均勢。

因爲這些事實連續發生，而直接間接對於中國都有很大影響，同時中國單獨抗戰已達八月，而一般人所希望的各國聯合對日經濟制裁，蘇聯出兵援助中國等事實，還沒有實現的希望，於是有人禁不付又要提出外交再檢討的口號了。

在抗戰期間不斷地檢討我們本身一切，這是十分應該的，不過我們檢討外交問題，最重要的須把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們所走的外交路線，作一個對照研究，看看這兩者之間是否有衝突和矛盾的地方。

有一個前三必須弄清楚，即我們對日抗戰，不是爲了別的，最重要的是爲了民族生存，所以抗戰是我們本身唯一責任，國際情勢之變動，固然可以使我們時悲時喜，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放棄神聖抗戰的使命。

弄清楚了這個前提，我們再來看幾個月來國際形勢的變遷。在前而已經講過，德國之承認偽滿，在稍開國際情勢的人，絕不足異，德日既係同盟國，德國之爲日本處處聲援，毋寧謂爲必然的，這樁事實，對於中國之應否對日繼續抗戰，沒有絲毫影響，而且以德國之忙於應付歐洲局面而論，他對於遠東的注意力根本是很薄弱的，所以更用不着懼怕。

第二、艾登外相去職，英國對德意之間重開談判之門，這一方面固可以看作爲英國放棄了集體安全制度，而要求與意德兩者之一妥協，以維持歐洲之安寧，但同時也可以認爲英國正欲折散德意軸心，或者是使歐洲的安定以應付遠東情勢，這兩者之開究如何發展，現在還不能預測，但是無論爲何，均非或德意軸心被折散，對於我們的敵人日本都是有害無利的。

所以艾登之去職，英意重開談判，敵人是帶了十分驚懼的眼光在注視它之發展，敵人對於英意德間之談判，既不樂觀，當然我們也沒有悲觀的必要，而且與艾登辭職同時，英國國內民主與和平勢力也猛烈高漲，這至少可以阻止張伯倫對德意作過分的讓步。

當然，在中日長期作戰期中，除日本海軍空軍兩政策通過政府，直接向英國屬地挑戰，英國出兵援助中國，究竟是不可想像的。不過要說英國想藉中日戰爭以安定歐洲局面，因而不願中止中日戰爭，也未免言之過甚。

日英衝突，並不限於對華問題，對華問題也許是日英矛盾間最脆弱的一環，日英的矛盾，主要的還是在經濟方面，尤其是在最近日本附近而英屬殖民地，如印度，奧大利亞等處，幾年來受賤價日貨傾銷的影響，幾使英貨不能立足，這種衝突無論如何都不能消除的。所以英國儘管在主觀上想對侵略者妥

協而企圖苟安，但客觀事實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第三、談到蘇聯出兵問題，蘇聯出兵參戰，對於中國是否有利，根本就值得考慮，因為一旦蘇聯立刻參戰，英美等國是否還願意援助中國，就是問題，也許最終還會站在敵人那一方面，我們與其因獲得蘇聯的參戰而喪失英美法等國的援助，還不為讓它站在幕後，牽制日本的兵力，策動英美法等國，組成一條有力的國際和平戰線，來支援中國的抗戰，其效能尤為確實可靠。

綜上所述，德國之承認偽滿，英國外相之去職，以及蘇聯之無參戰表示，對於中國抗日前途均無若何壞的影響，反之，在我們堅決抗戰的原則之下，我們的國際地位與日俱增，全世界的輿論和人民一致同情中國，而英美法蘇這一個和平集團，也因為我們的英勇戰蹟，日益團結走上反抗侵略陣線的道路。

三

英美法蘇的團結，為決定世界和平的唯一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固然目前這四個國家，聯名，雖理想，環境還很遠，但是聯合基礎業已奠立，它是奠立在下面三個聯繫之上。

第一是英法合作，自斯待萊薩陣線破裂後，英法合作即日益堅實，英法同樣是維持派的主腦，同樣是國聯會一柱石，同樣是反對德義冒險行動，尤其是在德國吞併奧大利，義國大舉進攻西班牙時候，英法合作只有一天一天更為緊密的。

第二是法蘇的聯盟，當萊因河流域非武裝地帶被德國軍隊佔領時，法國就感覺到僅是英國的援助還不可靠，所以在一手

拉住英國之後，更緊緊地拉住蘇聯，訂立法蘇軍事互助協定，使歐洲局面才能苟安一時，現在正是法國人民陣線執政的時候，法蘇協定不但可奉行無滄，而且溝通兩國軍事合作的參謀會議也在不久以前舉行了。

第三是英美的合作，這兩大民族的合作，是日本最為恐懼的，在這次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極力討好美國，想折散英美的合作，可是事實上英美的關係反日趨良好，一方面英美商約的締結已有成功之兆，另一方面在美國軍艦參加新嘉坡軍港落成典禮之後，英國海軍的聯合行動也更趨於積極了。

由英美、英法、法蘇的三角關係日漸緊密形勢觀察，在經過一個相當時期之後，英美法蘇的大團結，顯然的有充分實現的可能性。一般淺見及悲觀的人士，他們只看見侵略狂焰的高漲，而沒有看見和平巨浪的澎湃，所以結果對於抗戰所引起國際局勢只有悲觀，無形中減少了我們抗戰的許多勇氣。

在德國宣佈承認偽滿之後，我政治部某要員在所發表的談話中說到，我國為求民族生存而抗戰，決不因任何一國的外交轉變而動搖我既定國策，可見國際形勢根本就不能動搖我們既定國策，何況現在國際形勢還是一天一天向有利於我們方面發展呢？

外交本質上是代表國策而活躍，我們國策既已確定，在國策之下所決定外交路線，當然應該力求其正確，我們不要只看見侵略狂焰高漲，而夢想以為參加侵略陣線，或可苟安一時，這只有使中國走到唯一破滅之境的。

我們為民族求生存，為維護國際和平與正義，只有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侵略者奮鬥到底，事實上只有和平陣線

的加強，才似抑止侵略陣線的前進，抗戰以後，我們所執行的同盟者德意兩國，這三項外交政策都是異常正確的。隨着今後：(1)聯合反對敵人侵略政策及愛好和平的英法蘇等國。(2)通過國聯以獲得其他國家道義上的援助。(3)中立敵人的軍事有利的配合，才足以制敵人之死命。

最近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羅承烈

一 楔子

現在的國際情形，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嚴重了！中國是弱國，對於國際局面之整個變化，我們還不配當導演的主角和配角；他好轉，我們不能為力，他壞轉，我們也無法挽回。但是中國總是國際之一環，國際的情形自然是直接反應到中國來；中國的情形也一樣的是影響到國際局面之變化。因此，對於國際形勢之演變，與中國抗戰之前途，當然不是漠不相關的事，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明瞭的認識。

國際情形太複雜了，我們這裏所說的，只是關於「最近」的形勢。尤其對於中國抗戰有關的形勢。說到與中國抗戰有關，遠因很多，近因更自不少；不過爲了界限明瞭起見，最好以「七七」事變後之情形爲主。

二 抗戰初期的國際觀感

「七七」和「八一三」中日戰爭的正式爆發，國際間當然起了異樣的驚視，也許他們最初還不相信這戰事竟會一發而不可收拾。中國是國聯會員國之一，當然是要以日本之侵略行爲訴諸國際聯盟。合理解決。國聯本來不健全，日德意早已退出了國聯，不特日本可以根本不理會國聯，德意也自然爲日張目；而

美國又不是國聯會員國，所以支持國聯者只有英法蘇三國爲有力。但法國對中國的利害關係較淺；英國則外強中乾，態度遊移曖昧，其外交政策素極持重；而蘇聯則又處處不能不注視英國之動向。所以國聯最初對我們的情形，雖極盡同情和關心之能事，而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觀望」罷了。這觀望的原因，一則由於其本身力量之脆弱，再則懷疑中國之抗戰恐不能堅持到底。

三 中蘇互助協訂以後

在外交路線上證實了中國的抗戰決心，這恐怕是要以「中蘇互助協定」之簽立爲一個重要關鍵。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在未與蘇聯成立互助公約以前，我們便沒有抗戰的決心，乃是說有了這個協定，許多的漢奸和準漢奸們即失去了「中國將加入反共協定」的煽惑口實，而國際間也知是日帝國主義者所宣傳的「共同防共」之根本不可能。這樣一來，無論國內和國外，都一致相信中國是絕不會和日本妥協的，不妥協當然是長期抗戰；長期抗戰當然在國際間發生重大之影響。所謂在國際間發生重大影響，直接是列強在中國的商務利益，因此發生重大變化，間接是國際間也會醞釀出重大的事變。所以中蘇互助協定之成立，世界「和平陣線」是無形中加強了一環，中蘇間過去貌

合神離的關係，現在是密接得多了！

中蘇互助協定是去年八月十一日成立的，根據協定之內容，如第二條規定為：「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這很顯然，中蘇協定並不是中蘇兩國間的問題，實與一般「侵略國」都有關係。實言之，日本與任何侵略國家，假使要進攻中國和蘇聯，我們兩國皆不能放棄此種互助義務而直接或間接以協助侵略國之行動。所以中蘇協定，就法律上觀察，這條約是消極的；但從政治上觀察，這條約一方面是結束了二國間過去的一切恩怨，另一方面實與整個世界「和平陣線」，「反侵略陣線」兩大壁壘都有直接影響；確帶有幾分積極的性質。此種積極意義，還不止上面所述「表明抗戰到底決心」，「不會加入反共協定」而已！後來一日德意反共集團之明白出現，這不能說與此事沒有直接關係。所以說：中蘇互不侵犯協定之成立，那是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前途有重大關係的一個主要關鍵。

四 九國公約會議的影響

爲了中國神聖英勇的全面抗戰，及最高領袖在歷次對內對外所發表談話中看來，與夫中蘇協定意義之旁證，列強已明白瞭然於中日戰爭之不會遽爾停止了！中日戰爭不停止，當然非世界和平之福；國聯爲了中國，聲訴，他在職責上和道義上都不能不加以過問。最初國聯是將此案交與中日諮詢委員會討論，該委會於十月五日成立討論兩點：即（一）日本侵犯中國，實違反其在九國公約與巴黎非戰公約下之義務；（二）建請邀

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從速開會，以期用協定方法終止中日戰爭。這個結論；由小組委員會製造報告書兩份，即於十月五日由國聯諮詢委員會通過，另加一議決草案，提交國聯大會，而由大會於十月六日以全體一致通過該決議草案及報告書兩件。於是「對日譴責案」，及定期「召集九國公約會議」，便成爲中日問題在國際間所發生之實際效果了。

爲什麼不由國聯直接處理而須召集九國公約會議呢？主要乃爲了美國和德意等國起見，因爲他借或則爲非會員國，或則爲正式退盟國，以九國會議（實際上不限于九國）召集之，這比較容易得到普遍有效的結果。雖然該項會議之最後決定，並沒有採取「集體制裁」的主張，但公認日本爲侵略國，而一致施以譴責，並分別各就其國家環境而給予中國以援助，這在法律上地位和道義上，對中國抗戰前途總算是有利的。至少，這對日本的侵略行爲，不啻作了一次有力之國際宣傳；同時對於任何友邦之援助中國是不能認爲不正當的了。

相反，九國公約會議之援助中國，同時也促成了日德意反共協定之出現。雖然在事實上，我們早已認爲日德意同盟之後，這種三角同盟協定，是早在吾人意料之中，然而該協定必於此時正式出現者，乃所以表示對九國公約會議之一和平陣線一成立對峙之局也。和平陣線是以尊重領土現狀和條約義務，及反對戰爭與戰爭威脅爲主，德意日雖以「反共」爲名，其實即是以反對此種和平陣線爲主。實言之，便是對九國公約會議一種「集體行動」的威脅；我們對於這種威脅，不表示驚異，我們只覺得這是我們「抗戰力量堅強」的一種應有之「反響」，和正義抗戰所得到國際間正義援助之一種必有「對峙之局」。因此，我們認定九國公約會議之召集，這是國際形勢

與我們抗戰前途發生密切關係的一個極具體有效之行動。有了這項行動，然後才使國際的陣容更明朗化；然後才使愛好和平正義之國家更積極的給予中國以軍械上經濟上之有力援助；然後才使過去以假面具對我，而又與我陸空軍有關係之德意侵略國家，逐漸失去了在中國抗戰國防上的重心地位。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大事！這個重要階段，我們怎能把他忽視？

五 國際反侵略運動及其他

國際聯盟雖然因為受種種的牽制，不能迅速造成制裁侵略者與對我「明白」援助的舉動，但是全世界人民大眾的正義感，同情心，確是完全站在我們方面的。最具體的例子，是今年二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反日援華大會」，與目前在各國展開着的抵制日貨運動。所謂反日援華大會，是由國際反侵略大會產生的，國際反侵略大會便是原來的世界和平大會；由於「反侵略」三個字更能表示我們當前的積極的意義，所以改用了現在的名稱。當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會議中，我們曾提出了四項議決案，希望能促其實現：（一）世界各國公民一致宣佈日本軍閥為全人類之公敵；（二）世界各國公民及團體實行抵制日貨，停止對日經濟，金融，信用，軍火……及其他一切足以增長日本侵略之供給與援助；（三）世界各國公民及團體應對中國為各種經濟，信用，軍火……及其他一切足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供給與援助；（四）國際反侵略大會選舉代表團，向下屆國聯會要求實施盟約第十六，十七條，以抵制日本侵略者。這樣的情形，在國際間產生了一個專門援助中國的反日援華大會，會議的主要任務，即在組織「國際抵制日本與扶助中國之陣線。而英國之一同情中國宣傳委員會」且在牛津街舉行

反日示威大運動，各界人士都熱烈參加，主張一致抵制日貨，政府並允許不貸款與侵略國家。同時在中國方面，便由侵略分會規定二月六日起至十二日止，為「反侵略運動宣傳週」，由各界分別實施反侵略宣傳，以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至於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士與勞動者團體為了同情我們的抗戰，而自動發起抵制日貨與拒運日貨的運動，那更是在各方面風起雲湧了。據反侵略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報告，在目前十個國家中，進行抵制日貨的團體，已經包括有一萬二千三百萬人之多。這些團體，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第一是各國的工人團體，如澳洲，紐西蘭，南非洲，英國，法國，美國的工會工友；還有國際工會聯合會與赤色職工國際，都會有熱烈同情中國，拒運日貨的議決與表示。第二是教會慈善團體及婦女團體，如羅馬教皇的捐款救助我國難民，全美國防婦女會的要求停止對於侵略國家的原料供給，蘇聯紅十字會的捐款三十三萬救助中國傷兵難民，都是具體的例子。第三是重要的國際政治人物，如英國倫敦市長發起募集巨額捐款，救助我國難民，美總統羅斯福號召美國人民募捐一百萬美金救助中國難民傷兵。第四是世界名流學者與學生團體，如愛因斯坦，羅素，羅蘭與杜威等發起的援助中國委員會，全美學生大會的要求以集體行動反對侵略，並援助我國。第五是弱小民族的對我援助，如印度的舉行「中國日」，在新加坡的印人也發動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運動。第六是許多同情反侵略的熱心的個人，如法國德柏烈淑女士請求中國來中國前線服務，荷蘭一個十九歲無名青年的致書蔣委員長，同情我國抗戰，表示願意援助我國人民的決心。——這許許多多的事實，一方面是表現國際間之一反日援華運動，將必有有效的反應到各國政府之內政外交方針上去；另一方面是表現中國之

英勇抗戰已獲得了國際間人士的同情共鳴；而國際間人士之同情與聲援，更加强了我們抗戰的勇氣和決心。因此，我們對於世界反侵略運動之經過，應該相信他對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都是有直接影響的。

六 英國外交轉變後之形勢

就上面這些情形來說，除了一日德意同盟一算是一種對我不利的反響之外，其餘一切都是對我抗戰前途有好處的。然而不幸得很，英國張伯倫首相的一親意外交政策之表現，竟造成了「德奧合併」的事實。張伯倫之親意外交政策，固然不希望有德奧合併，及威魯提克……等等事件之發現；但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一筆血賬是不能不寫在張伯倫外交政策身上的。張伯倫與艾登意見之衝突，我們應該認爲是大英帝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問題。所謂根本問題者，即艾登是偏重在維持國聯體系，而張伯倫卻傾向於四強公約是也。站在國聯體系，當然要擁護集體安全制度，故必須聯合法蘇美及許多國聯會員國以對付退出國聯，及破壞國聯盟約的侵略國家。加入四強公約，（四強公約爲英法德意四國）即無異放棄國聯體系，而與退盟之德意日等國採取一致行動。張伯倫這種政策，究竟對與不對呢？其對於遠東的影響，直言之，對於中日戰爭的影響，究竟是利還是害呢？這正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

從樂觀方面的看法，是說英國此舉，乃爲「折散德意軸心」而發，即「妥協意國以孤立德國」，免德國在歐洲方面肆行無忌，隨時以殖民地等問題來威脅他們。所以在法國前總理佛蘭亭一般人，也同樣的主張「摒棄國聯，和緩德意」。因爲他們認爲：假使英法能夠分別妥協德意，使德意不至於同時一致與風作浪，乃是安穩歐洲局面的最好方法。換言之，英法對德意妥協的成功，那也就是英美在太平洋上行動的開始，即必須中止歐洲方面之一牽制局面，乃可以使英美得以專心過問遠東問題，使英美對於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均勢」得以重建起來。英美能與日本建立太平洋之均勢，當然是對日本的一種威脅，當然可以制止日本之繼續侵略行動。所以從樂觀方面看，張伯倫之妥協德意外交，是對於中國抗戰前途有利的。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適得其反。他既然對德意妥協，他可以承認阿比西尼亞爲意國所有，他可以撤退西爾自願兵而一任叛軍及援助叛軍者之橫行，他可以擴大地中海英意君子協定之範圍，而劃分勢力區域，及交換軍事情報等；他進一步，也未始不可對遠東問題採取與德意同一之行徑；換言之，他即未始不可如德意之「承認滿洲國」。這還是就「想像」方面而言，在事實上我們只覺得張伯倫此舉，乃不過造成「梭里尼向英國「勒索」之成功而已！英國每一次對墨氏之讓步，却好是增加了他在柏林方面的價值，而給彼以向全世界顯示法西斯威力的良好機會。質言之，英國保守黨之退席政策，不特不足以折散德意軸心，而反增強德意的聯合日德意聯合的具體表現，即爲德國吞併奧國之事先得了意國的默契，及德意之繼續接濟西班牙叛軍軍火與自願兵，而使佛蘭哥得以乘勝進攻。目前奧國問題，西班牙問題，捷克問題，已經有重燃世界烽火之可能；蘇聯正在那裏忙于發「請柬」，商討如何制止侵略之道；法國的人民陣線新內閣，也急不暇擇的速速成立了！美國亦發出「巨吼」，深以「孤立政策」爲非是；而英國且將因此引起閣潮，迫張伯倫辭職。——這些情形，其累積而來之因素，固然很多；但英國的「重實際而輕理想」，講操縱而不顧

道義的陰險外交，平衡主義外交，妥協主義外交，這的確不能不說是「禍亂之源」。

七、結果是操之於我則存

英國妥協外交的「惡果」，將怎樣結算？那是另一問題；只是目前歐洲的形勢，的確是相當的嚴重了！這種嚴重局面對中國抗戰前途又是怎樣的呢？大概不外兩種看法：一是和平的妥協，一是大戰的爆發。所謂和平妥協，當然也是暫時的，而妥協的對象，無疑的是繼續向德意日等侵略國家讓步。為什麼要向侵略國讓步？為什麼這讓步又是暫時的？英國的紳士們的一般輿論便是這樣，他說：「只要時局再能維持十六個月，或十八個月，那英國便可以大規模擴軍了！只要擴軍完成，那時英國便無須向別人謙卑徵詢意見而不着答復，或向別人明白抗議而公然遭受蔑視了！」這個意思，即是表明英國之處處委屈求全，實乃目前尚無「力量」應戰的原故。因此，不能不拼命的擴軍，不特英國最近又在擴軍，便是美國法國俄國等，又何嘗不以擴軍為「最後法寶」。既然只有擴軍才是「真實可靠的法寶」，那在擴軍運動一日未完成之前，當然只好和平的妥協了。而和平妥協，便是使法西斯集團得以繼續增長其勢焰；德意在歐洲必以恢復殖民地等大問題，及捷克，波蘭等之嚴重

糾紛，牽制英法不敢有所作為；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必以更兇狠之態度威脅援助中國之友邦，而拼命以軍事，經濟，政治等陰辣手段，圖「最後之一逞」。這樣說來，列強對侵略國和平妥協的結果，是對中國抗戰前途不利的。

但和平妥協，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目前捷克問題，法蘇的態度與德國的態度，便尖銳得很厲害。而收復舊有殖民地問題，英國又何能拱手以其屬地讓人？這都是「切身利害」問題，國際間不講道義，豈能不讓利害？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仍不過時間問題耳。這時間是否為十六個月，或十八個月，很難預期，而中國則只要能堅持抗戰下去，則世界大戰之到來，對我們並無所害。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國際形勢之好轉或逆轉，必須「操之在我」，而萬不可依賴別人。「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這是一「自勵」，「自立」不異之論！所以我們對國聯形勢不要悲觀，也不要樂觀；他們以實力制裁侵略國，固所歡迎；他們已自顧不暇而埋頭于世界大戰之準備，我們怎能不使長期抗戰之局，與他適應聯接起來呢？於是我們的最後結論：乃是可能的利用外援以打倒日敵，拼命的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勝利。

一九三八、三、十九日晚、重慶。

戰時行政再檢討

曹立瀛

一
抗戰初起時，筆者發表了「戰時之行政」一文（見本刊四卷

二期）其中列舉幾點戰時行政的原則，和具體計劃的綱領，以調整行政機構，利用行政人員，改進行政設施為中心。事實上，戰事牽延半年，政府對於行政機構，誠然有相當的調整，但

片段的調整，以及人員與設施各方面，是否能適應這個偉大時代，值得我們再討論一下。

二

關於中央行政機構，一般行政學者渴望已久的調整，今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以明令實現了。此次調整可分兩點：第一，行政機構的統一，第二，行政部門的裁併。從前直屬國府而與行政院平行的有軍事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及其他次要的獨立機關；行政院下，原設內政，外交，軍政，海軍，財政，教育，實業，交通，鐵道，等九部，蒙藏及僑務兩委員會，及衛生署。去年秋天，軍事委員會更擴充了八部，簡直與平時行政機構完全重複。筆者「戰時之行政」的發表，雖在軍委會擴充之前，曾主張戰時內閣的組織，無論就行政院改組或就軍委會擴充，祇須要一個統一指揮的戰時行政機構；但事實和這種理想完全相反。一被人們對於新刺戟的反應，不會用 *Insider* 方式去研究領悟，喜歡和猩猩猴子一樣用 *Trial and Error* 方式去嘗試錯誤，幸而成績和效率終究會告訴他們此路不通。所以，八部之中，有幾部根本就無法成立，有幾部朝生暮死，一月一日以後，擴大的軍委會差不多完全恢復了原狀。

國府元且令稱「海軍部着暫行裁撤，其經管事務歸併海軍總司令部辦理」。「實業部着改為經濟部」；「建設委員會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水利部份，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第四部着均併入經濟部」；「鐵道部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公路部份着均併入交通部」；「衛生署着改隸內政部」；「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衛生部份着併入衛生署」。（見國民政府公報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渝字第十號）原來掌管重工業的第三部和掌管輕工業的第四部，完全和實業

部工業司的職權職務相重複，不但不能使軍事政治相溝通，徒然發生矛盾與抵觸。其次，全國經濟委員會在美國棉麥借款後成立，掌管水利，公路，衛生等，支離實業，交通，衛生行政的統一，根本就是應當裁撤的駢枝機關。建設委員會也是如此，分了一部分水利工作，並管轄一些無系統的公用事業。餘如海軍部之暫裁，鐵道交通之合併，衛生署之改隸，皆為增進效率，統一事權所必需。政府能打破一切人事關係，毅然改革，值得我們興奮，而希冀革新的成功。

從一方面說，中央行政機構仍有改革的餘地。即使暫時將本文不及討論的大問題——黨與政的關係及政與軍的關係——撇開，專就行政系統本身說：一方面還有許多殘餘的重複，駢枝，不做事的機關應當裁撤，尤其是各部會的附屬機關，有重新調整減併的必要；一方面原有應當保留而加強工作的機關，在過渡的混亂環境中，竟被支離破碎了不少，例如數年來慘淡經營的超然主計制度，雖在新修正的內政，經濟，交通等部組織法中（見國民政府公報一月十五日渝字第十四號及二月十二日渝字第二十二號），主計系統仍有其地位，但實際上因環境關係與人員疏散的結果，這一個機構已難有充分靈活的運用。

關於地方行政機構，政府似乎也有調整的趨勢。不過，過去幾個月來，調整人事方面較多，組織方面祇有西康建省委員會的充實。按修正西康建省委員會組織條例的主要點，為將原有之秘書處及民，建，財，教，保安五科，改為秘書處，政治組，及經濟組，政治組下設民政，財政，教育三科，經濟組下設交通，農牧，工礦三局，——顯係準備開發邊疆經濟，以充實抗戰給養能力，（見國民政府公報一月二十二日渝字第十六

號)。人事方面的調整，自去年十一月底至現在（二月底）止的三箇月中，先後有安徽，湖北，湖南，貴州，江蘇，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省政府的改組，和許多行政督察專員的更調，改組更調原則，似乎是前方各省以軍事人員負責，後方各省以建設人員負責，——原則之合理化，自不待言。

不過，除上述人事調整之外，機構本身之調整，還沒有開始，尚須當局更大的努力。第一，地方上許多重複駢枝機關，為害為甚的，可致虛糜公帑，散亂事權，以使指揮不能統一，效率不能增進，開支不能經濟，——這些機關，需要澈底的裁併。筆者不願在這裏公開地列舉，單就一個例來說，在我們眼前面的，財政部設在重慶了，在財務行政監督方面，四川省有財政部特派員公署，行營有財政監理處，財政部又有各種稅務監查員，——他們的使命，無非是監督四川財政。第二，地方上有許多不良的行政制度，應當用大刀闊斧的手段來革新。這些制度，往往帶着封建的色彩和官僚的惡習，積極方面能使新政不能推行，負不起後方建設的重責，消極方面能使人民永受疾苦，說不上民足國強的金圖。筆者也不及列舉這些，各地的苛捐雜稅已是大家知道的顯明例子。第三，地方行政機構，在非常時期中，應有充分的充實與擴大。在平時，中央機關的龐大與地方機關的狹小，適成爲一座倒置的金字塔，頭重腳輕。以一二十人組成的政府，每月月薪數十元，職員，能負起吏治，保甲，徵兵，戶籍，土地，賦稅，振興農業，開墾荒地，發展工藝，修築道路，策進教育，……等等重要工作，加之戰時前方的供應，後方的準備，總動員的執行，當然不能勝任。還有更有趣的例子，如後方建設希冀中，貴州，還行着縣長包工制，一等縣每月一千一百元，二等縣每月一千元，三等縣每

月九百元；即使有賢明的縣長，枵腹從公，將所有包價一概用於地方建設，也負不起民族復興根據地的重責，何況縣長還得裝幾個錢進荷包，聽說雲南還有每月二百元一縣，使地方官吏「不得不」貪污了。所以在全民抗戰的過程中，應當急切充實並擴大縣市政府。

三

關於行政人員，近來政府之處置，却出人意料之外。研究戰時行政的人們，總以爲抗戰期間全國總動員下，一大材總動員——是必要而迫切的設施，——所謂人材總動員，就是集中全國人材，參酌學力經驗，分前線後防的各適當工作，務使「事得其人」而「人盡其才」。事實上，政府機關在去年八月十日敵機襲京後，即指定一小部份人員照常辦公，其餘則留京聽候調遣；十一月十七日後中央機關移駐重慶時，人員再度疏散；抵達鄂湘一帶後，人員三度疏散。疏散數量，以留存原有員額五分之一爲標準，於是華中一帶，流連失業，無家可歸者萬餘人，加以前方各省退却的公務人員，及地方機關疏散人員，併各被疏散人員之家屬隨之西上者，現雖無正確統計，筆者估計，當有二十萬人。此二十萬人之職業，則爲抗戰期中反無工作的官吏！

「疏散」，誠然是一個美麗而風雅的名辭，比一些笨人說「裁員」，既好聽又有面子。但是，疏散的結果是什麼，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其實當初稍有常識的人們也就告訴我們了——至少有六個惡影響。第一，優秀人材集團的解體。現任官吏及職員，固然有一部是親戚故舊等夾袋中的私人，但是近年考選制度，銓敘制度，和考績制度的推行——不論此等制度的

缺憾如何——歷來升降遷調淘汰之結果，總有大部份公務員可稱為優秀人材。賢明之政府，選能任賢，培才拔學，生聚尙恐不及；今一旦使萬餘人之工作集團無組織無計劃而解體，是國家對人才之不經濟。第二，經常政務之怠惰與非常工作之難舉，此等人員，以其學識和經驗——疏散人員中有不少服務十年者——加緊工作，辦理原有職務，自屬事倍功半，剩有餘力，正可就戰時設施，詳籌計劃，努力推行。戰時工作，原不獨不應少於平時，亦且多於平時（詳見下節），於是人員祇恐不敷，甚至須增進工作效率，延長工作時間，以應付非常事變，——歐戰時，各國先例莫不如此。今中國以組織不密，訓練不精，準備不足之國家，抵抗物質充實，技術先進的日本，應當如何運用人力，以抵補科學機械之不足。事實上却緊縮組織，裁減人員；其結果：一方面使原有政務，或因裁減後人員不敷分配，或因調動後人員不及熟練，不能如常能進行；一方面使剩餘行政人員，受能力及時間的限制，不能充分展才畫策，指揮運用新的企圖與事業，担当長期的戰爭；更況政府既無量才任用的決心，人人遂自危，各存五日京兆之心，自謀將來出路，即使有發展抱負的機會，也無暇專心於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下，各機關連原有政務還不能繼續，那能希冀有適應抗戰的非常設施。第三，智識份子失業的增加，如前所述，公務人員疏散後，直接失業者估計至少四五萬，間接失業者估計至少二十萬。和失業相連的是貧窮。此次疏散，大都裁撤科員以下的職員，可憐每月只賺得四五十元的書記，和俸額七八十元，經過七折八扣後祇餘五六十元的辦事員，一家也許有老小七八口靠他吃飯。在平時，失了業還可以賣花生米；在戰時，失了業的中國式書生，投兵也不能通過體格檢查。失業，貧窮，飢寒，疾病，

自殺、和各種都是罪惡的增加，是一條路上的幾個站。在政府裏無非在難民統計總數裏加幾個數目字，能否救濟還是另外的問題；在人民方面，却有無限的顛沛流連，酸辛痛苦；——還說什麼衛國安民。第四，削弱抗戰的力量。智識份子，原可在思想智慧方面，參加抗戰的籌劃與設施；即使政府認為戰時不需要此等人員，也可分散各地從事民衆訓練，或努力生產事業。但是公務人員的疏散，却無一些善後的籌劃！在戰爭中，合於經濟學上生產條件的，固可稱為積極生產事業，即使不合經濟學的條件，而從事於供給戰爭消費的，也可稱為消極生產事業。現在被疏散的人員，生死成敗，聽其自然，國家無法使之加入積極或消極生產事業，即不啻不令其參加戰爭；於是五萬萬人口中，至少又有這二十萬人沒有參戰，這一部份抗戰力量因之削弱。第五，治安困難的增加與傀儡漢奸的製造。無工做與無飯吃的結果，凡不願束手待斃的人們，惟有挺而走險。除小部份有所積蓄移居西南，一部份有路經營另覓工作者外，一部份腐化分子，散入鄉里，成為土豪劣紳，一部份血氣青年，流落天涯，淪為盜匪，一部份或覺有機可投，退入敵人後方，參加傀儡組織，作為漢奸。後面的三種總使我們後方治安與秩序維持上，增加困難，甚至還加強敵人擾亂的力量。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抗戰情緒鼎沸中，平白地向這些青年官吏澆一盆冷水，難怪，一住現任高級軍官的朋友，哭不得笑不得地說，「疏散人員該當是漢奸出的主意」，不像抗戰政府的設施。第六，最後一件比較小的問題可提出的，是人員疏散有失公平原則。疏散是全無標準的；不是依機構功能的需要，因為有些機關中無事可做的部份不撤消，而不能裁撤部份的人員反均被疏散；不是依職位，因為疏散雖大多數為委任以下，

薦任聘任也有除名的；不是依性別，因為大多數機關雖將女職員全部遣散，却也有鳳毛麟角似殘餘；不是依年齡，有人推想疏散是淘汰老弱，但是去了的老職員也許是經驗豐富的幹員，而留的未必沒有老朽殘疾；不是依學識經驗與能力，因為裁了的有不少精明幹練，歷次考績皆級加新的，同時留的又未嘗無昏庸驚鈍，不學無術的政客官僚；——因此，專外人誠不知道疏散的標準是什麼！更有一件掩耳盜鈴的事，就是疏散的表目的，是縮減經費，可是，裁撤低級職員而留剩高級職員的結果，裁撤人員數額佔總員額五分之四留剩人員數額佔總員額五分之一，可是據某種估計，裁撤人員俸薪之總和，僅佔原總俸薪額五分之一，而留剩人員俸薪之總和却佔原俸薪總額五分之四。然則疏散究竟爲了什麼？讀者看了一而疏散，一面補充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不用筆者來解答。

近來政府當局，似乎也在嘗試中覺着誤錯了，除前軍委會第六部登記專門人材及戰區教員學生，及現在教育部登記戰區失業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生及社教工作人員（見二月二十三日新蜀報）報紙上還登載着「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團員登記通告」登記展期至二月底「本院及所屬各部會疏散在外人員，志願參加本團服務者，務於期內開具姓名，原服務機關，原任職務，原級俸，何時在何地奉令疏散」等寄送……聽候遣派」。又載「司法行政部通告普字第二號……查本部所屬司法機關職員，在戰區內者，多因不能執行職務而離任，在戰區外者，多因緊縮辦法而疏散，此項失業人員，自應先予調查，以便設法安置，俾免流離失所，爰制定戰區司法人員登記辦法，通告周知，……可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具呈來部聲請登記。（均見二月中旬各大報之廣告）從這兩則廣告裏，我們可以證明疏散

政策的失敗；希望來者可追，政府對於疏散人員登記後，有切實具體的善後辦法，以增加抗戰力量，那麼，未始不能亡羊補牢。

原來戰時行政人員的處置，需要人員管理（Personnel Administration）的科學基礎，和政治革進的通盤籌劃，不是在沙發椅上決定政策，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在亡羊補牢的時候我們還應主張「集中人材，量才分配」。「集中」，就是反疏散，也就是現在的登記，加上一個範圍更廣大的專門人員登記。「分配」，就是分散到各地的戰時積極或消極生產事業裏去，實際的分配決定，行政當局自有賢明，不必筆者越俎；但是現在看得見的，至少有四條路徑：第一，國防設計，無論現在是否有能切實工作的「……委員會」或「……參議院」的機構，抗戰歷程中所表現的「無組織，無計劃」，是顯明而普遍的現象，原來這些「會」「院」裏，雖充滿了雙料、三料、四料，以至於二十料的委員，却很少眼光遠大，思想清敏，具有專門學術的人材。政府應就專門人員登記的人材中，選一部份參加這方面的工作，從事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有關抗戰及復興的計劃。第二，經濟建設。戰爭的要素，前方是軍隊，後方是經濟。近來開發後方資源，發展後方實業，勵後方交通，調整後方金融的呼聲，也夠高了；但是實際的設施，却僅僅是起始。幾百處集體農場和推廣所，幾百座擴充的和新開的礦山，幾千家機械化工廠和手工場，幾十條修理和新築的鐵路和公路，幾個農業、工礦、和貿易的統制機關，——如若積極工作起來，幾萬被疏散的行政人員便不敷分配。第三，民衆訓練。全民動員的運動下，遊擊戰術的開展中，我們利用中華民族無限的人力，博取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從南京到重慶，看見的民衆

運動怎樣，不用筆者多述。民族意識的鼓勵，戰爭技能的教導，文化知識的灌輸，游擊自衛的組織，實際戰鬥的領導，——處處需人。全國約二千縣，一縣如分配二十人參加地方黨部、政府、和軍隊工作的話，失學的青年可以安置四萬。第四、地方行政。即使不直接參加戰爭，失學的人員——尤其是被疎散的行政人員——可去充實普通地方行政。前面說過，現在行政系統須重腳輕，縣市政府職員，不能負起戰爭的重責，現在中央和省市政府，行政人員，正可借這機會，參加地方工作，一方面加緊縣市政府實力，一方面還能溝通中央與行政的學識和經驗。此外，軍隊政治工作和國際宣傳工作，也可容納一部分人材。

有關「集中人材，量才分配」政策，有兩個問題須附帶提及。一是打通中央與地方間障礙，實際政治問題；此點，在於政治家運用，而不在原則討論，本文暫詳述。二是政府徵用人材，經費問題；此點，筆者又得提起「同工同酬」原則。誠然，長期抗戰中應有極度緊縮的經費，開支，俾大量財富得以用於軍事補充與經濟建設，這是研究戰時經濟的人們所公認的。不過，用於戰時積極生產事業人員方面，實際上是經濟內生產成本之一部份（例如農礦實業人員之薪金）；用於消極生產事業人員方面的，實際上是軍餉。另一方式（例如民衆運動指導員生活費）。主持戰時行政的人，應當問某項開支對於抗戰力量貢獻是否相稱，以最小開支換取最大成績，謂之「經濟」，謂之「效率」。所以人材集中分配與利用，如若被認為必要時，政府就應當籌劃這筆經費，而不應當盲目地節省，況且，還有不增加現有人員俸薪總額的計劃在。如前所述，裁撤人員五分之四，經費僅減縮五分之一；如若現有官吏祇

領原俸五分之一，那麼，豈不可容納那被裁的五分之四！這不是理想而是實際可能的：一位簡任官月薪四百三十元至六百元，假定平均每月五百元，實支一百元，便可容納八個委任或雇員。一位薦任官月薪一百八十元至四百元，假定平均三百元，實支一百元，便可容納四個委任或雇員。民族存亡的關頭，我們爲什麼不打破這些傳統的「官制」「官規」，減輕一些資產階級的風味，各人領取些生活費，動員大量的人力，來爭取抗戰的勝利？筆者相信，有志的青年中，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願意領取三五十元的生活費，爲國爲民犧牲頭顱熱血的多得很！即使人們脫不了封建式的資產階級習氣，必須有差別報酬的說，也不妨規定相當簡任的支二百元，相當薦任的支一百元，相當委任的支五十元，——我不相信前方將士能犧牲生命，後方官吏不能犧牲奢侈！

四

關於行政設施，本文除原則外，不能詳論。抗戰半年來，我們絕對相信，政府至少是在長期抵抗的路徑上走；至於走的速度能否適應這危急的時機，却是一個問題。健全的戰時行政設施，至少要有三個原則。

第一、常態的保持。戰時行政機關，除在戰區中不能行使職權外，應當繼續原有工作，不使間斷。理由是很簡單的，平時的準備就是戰時的基礎，戰時的設施便是這基礎上的進一步建築；如果平時的行政工作因戰事而停頓破滅，要在混亂中另建一個新系統，若非不可能，亦即不經濟。況且，戰時需要於內政的就是秩序的安定；現在破壞力量還不能達到本國政府的機關，在被敵人攻擊以前，先把自已的脚步紊亂，停頓原有

工作，不啻自己破壞內政的安寧秩序。再況，國家政治是永久的，戰爭是一時的，不能因一時的戰爭，失却政治的常態，置戰後復興問題於不顧。進此種種理由，可以說，因戰爭爆發而失却常態行政設施的，好像一個神經病人聽說強盜來了就實行自殺。政府自抗戰以來，借節省冗牘準備戰爭的美名，停頓了不知若干常態工作，還說什麼「鎮靜」，說什麼「平時如戰時，戰時如平時！」

第二、非常的設施。作戰時期中，一部份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的平時行政，應當用非常手段來革進，以適應作戰需要；此外，因戰爭而發生的另一部份行政設施，也當在統一的機構下，發動起來。譬如說，戰時糧食統制是作戰後的新需要，應當在經濟統制的整個系統下，用適當的方法，作非常的設施。這裏，非常時期行政顯然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戰時行政設施，無論在質或量的方面，均加重平時行政的工作，於是戰時政務應須更多的智慧與能力；二是戰時行政設施應具斬釘截鐵，大刀闊斧的手腕，澈底的改革。中國抗戰以來，減少了平時工作已如前流；應有的非常特殊設施，也在因循執舊中消沉着。例如說，研究戰時經濟的人們，誰都知道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現中國經濟結構，決不能適應抗戰的需求，可是半年來依舊是無計劃地，聽其自然地，苟且因循；現在，許多人對新改組的經濟部，正懷着許多新希望呢。

抗戰與官僚政治

一 現在政治趕不上軍事

自八一三抗戰以來，鑒於種種失敗的事實，大家都異口同

中國社會 第四卷 第三期 抗戰與官僚政治

第三、通盤的計劃。所謂全國總動員，自應有全盤的計劃。現在的總動員計劃如何，有關國防秘密，筆者不願多所評論。不過過去的半年中，我們不能承認總動員計劃實現的成功。例如，在軍事方面，一部份軍人的溺職誤國，以致各路敗績，首都失陷，姑且不論；在政治方面，無論就澄清吏治、或鞏固後防、或訓練民衆方面說，不曾看到有適當的努力；在經濟方面，誠然看到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設施，沒有聽說過一個整個的統制方案；再就狹義的行政本身說，移駐重慶時一退三千里，組織、文件、人事、交通方面的紊亂，真不像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現代國家。

五

總之，戰時行政的核心，不外精密的組織、周詳的計劃、和高大的效率，從組織、計劃、和效率裏，產生出靈敏統一的行政機構、各盡其能的行政人員、與革新統制行政設施。抗戰以來的政府，誠然不能如理想的所期，不過這也是中國歷來無組織、無計劃、無效率的政治環境的惡劣影響，在復興過程的中華，我們也不應認為意外而失望。我們總希望人民能信仰抗戰的中央，專家能協助革命的政府，使戰時行政在組織、計劃、和效率的途徑上邁進，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光榮。

孫嘯鳳

聲的說道：是軍事與政治的缺點甚多所致，必須加以改革使之適宜於執行抗戰的任務，然後才能轉敗為勝。我們英武的蔣

委員長已在這七個月來抗戰失敗的教訓中，積極地採取主動的

運動戰，進攻的防禦戰，同時廣泛地發動游擊戰相配合，將軍事上的缺點逐步加以整理，并毫不姑息地將違抗命令的韓復榘正法以後，軍令為之一振。所有以前陰謀保存實力的軍閥，已受天然的淘汰而失敗了。現在前綫作戰的官兵與後方準備補充的軍隊，無不精神團結，服從命令與指揮；而且抗戰勝利的信念益堅，殺敵致果的勇氣益壯，這只要一看最近數月來津浦平漢兩路的能支持，與東西戰場反攻的種種勝利消息就可證明了。

更有一層足以快人意者，當蕭溝橋事變發生之時，大家對張自忠之不能與馮治安之一樣極力抵抗，無不痛罵；但中央黨軍帶罪圖功，此次仍令其回師長原職，將其配備於隴海津浦綫上，改歸李宗仁將軍指揮，最近據報載該部竟能奮勇異常，建功甚鉅。此外如川軍，如滇軍，大家都想不到此次在前綫有如此光榮而壯烈的成績。所以我國現在抗戰的軍隊，無論從「量」的方面或從「質」的方面講，所有缺點，均已一步一步的改進了。

反顧與軍事息息相關的政治方面缺點，則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政治必與軍事互相配合，在積極方面，才可以發揮軍事之效率，消極方面才不致製肘軍事之進行；單憑軍事改進，而政治不能與之同時並進，也是不能收效的。固然，政府現已將疊床架屋的重複行政機構加以調整了，如鐵道部之歸併交通部，實業部之改經濟部，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及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等整個或局部之歸併經濟部，禁煙總監部及衛生署之改隸內政部……但政治方面那種查泄，因循，凌亂的現象，是否因這次調整了行政機構，而能改變過來，俾舊污盡滌，而暢生新機？換一句話說：政治方面的缺點，僅僅調整一下行政機構，是否能徹底改進，俾能適合抗戰

軍事的需要？

我們由過去以測將來，知道只「換湯不換藥」的調整行政機構，是無補於改進政治缺點的；而且擺在眼前的事實，政治上的「麻木不仁」的狀態，仍是依然如故，毫不見有若何進步，比起軍事調整的成效，真是瞠乎其後。這種政治趕不上軍事的原因何在？予嘗攷之，原因雖多，而官僚政治「陳陳相因」，實是其中最大原因。

二 官僚勢力無孔不入

予爲此言，或有疑我過甚其辭者。殊不知官僚政治的在中國，匪特不能策應抗戰軍事，抑且阻礙國民革命的大業，與國家一切生機的進行。總理在第一代表大會演講本黨改組問題時，曾明白告訴我們說：「我們自辦同盟會以來，有很大的力量表現出來，就是把滿清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後，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壞雖成功，建設上却一點沒有盡力……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既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目數，多於革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黨，乃此輩反革命黨（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國之反革命派，爲官僚與智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黨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黨事業。」

這可見我國舊官僚派在其政治失勢時，最會搖身一變，由黨外而加入黨內，將革命黨的「質」都加以改變——腐化革命勢力——這不僅總理在世時所感受的事實如此，尤其是本黨自民國十七年完成北伐時起直到最近抗戰時止，我們的軍事勢力

，雖然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北政府舊官僚的思想與惡勢力，却已潛移默長於本黨革命勢力範圍以內，根深蒂固而不可拔，致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趨勢，真夠令人痛心呵！

二 官僚的特質

官僚勢力爲什麼這樣無孔不入綿延不倒呢？且一個國家要執行政務或事務時，不能不有官吏，究竟凡所有官吏都屬官僚呢？抑另成一階級呢？這個解釋，總理在北伐宣言及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內說得異常明白，茲分別節錄如下：

(一)「官僚思想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自十三年來禍國殃民……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

(二)「凡民主國家所謂官吏，本人民之公僕，其自身實爲人民，於執行國家之政務及事務時，乃爲官吏。而中國之官僚，則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階級，其結果惟有助軍閥爲虐，以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軍閥；且藉以自肥。」

由此可知官吏凡能以公僕自居，而能盡職爲其主人——人民——謀福利者，並非官僚階級。我國此種官吏不能說沒有，究是居少數，大部分一登仕籍，都變成官僚階級。它之所以能無孔不入者，就是襲其一貫的傳統思想——逢迎諂笑，鑽競實緣。它一鑽入任何政治場合，遂如「附骨之疽」，無法將其割去。它只知自私自利，不知有國家，更不知有民族。自九一八以來，儘管國難日重一日，而它之窮奢極欲如故，儘管人民因水旱災而不聊生，而它之剝削已如故，儘管領袖急於澄清政治與復興民族之心如焚，它之輕鬆緩慢，歌舞昇平之生活如故；而且官官相與，互相關注，無論在上者如何英明，實難燭其奸

，人民如何痛恨，無法暴其惡，此明思宗所以有「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的感慨，此語不啻爲今之官僚階級寫照。

四 官僚政治影響於抗戰前途之大

我們知道：在這抗戰時期的政治，要使之能配合軍事，最低限度的要求，要做到以下四點：(一)發揚民族氣節；(二)樹立廉潔政治；(三)增加行政效能；(四)尊重國家法令；但對這種官僚政治如果不能從根拔起，試問能達到嗎？茲分述之：

(一)官僚與民族氣節 在這全面抗戰的時候，除以集體的力量與組織抵抗暴力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發揚我國忠臣烈士殉國成仁的民族氣節。但在官僚政治勢力籠罩之下，第一不能涵養孕育這種骨格峻峻富有民族氣節的人，其次官僚本身慣行婢膝奴顏，寡廉鮮恥，根本就不知氣節爲何事。試看歷史上「見危授命」與「臨難不苟」的人，有幾個時平日受了國家豢養的官僚階級呢？而如揚雄之頌莽，馮道之五朝元老，以及一切納降稱臣，視顏事仇，私通敵國者，無不屬於士大夫的官僚階級。就可充分的知道官僚與民族氣節極不相容了，此其一。

(二)官僚與廉潔政治 抗戰時期的政治，是在樹立廉潔政治，使國家的一草一木，都能用之於抗戰的需要，而無絲毫中飽之弊。但官僚貪污，是其先天的習性，故適與此相反。而且戰時的經濟政策與財政計劃，多半帶有統制性的，而官僚則正好利用這特殊情態，營私舞弊，大發其「國難財」。且革命政府裏之新官僚，其貪污手段，較之軍閥時代的舊官僚明搶硬劫的笨拙方式，真不知高出若干倍。它藉種種新建設的美名，動輒一樁事就可拿百數十萬入其私囊。但是它還可得到一個負責幹練的美名，所謂「名也有了，利也有了」，這種事在近年來，尤數見不鮮，足證有官僚政治即不能有廉潔政治，此其二。

一切都沒有宣傳到鄉村去

恨水

——抗敵的起碼工作也沒有做到——

國難嚴重到了這樣的地步，在每一分鐘延長，都覺得在我們肩膀上，又增加了一重負擔。現在除了死命掙扎，解除我們胸束縛而外，這些宣傳，組織，抗敵，初步工作，好像是不需要了，也來不及了。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抗敵的初步工作，不但依然需要，而且沒有人去作。縱然有人作，也作得不是那麼回事。幾個月來，因為對人民沒有發生宣傳上的效力，後方民衆組織無成績可言。除了失陷的土地裏，民衆爲事實所迫，不得不挺而走險來組織遊擊隊以外，就是許多接近敵區的地方，民衆依然沒有和抗戰發生絲毫關係。甚至民衆還有不知道中日戰爭是怎麼一回事的。推源病理，第一項就是沒有把亡國之可怕，抗敵之必要，宣傳到民間去。憑着我個人幾個月在鄉間養病的經驗，和經過皖鄂邊境十幾年耳聞目見，感到這抗敵起碼工作，宣傳一項，有許多須改正的必要。閑言少敘，把幾件事實來研究一下。

(一)標語 用一張紙，寫幾句話，向牆壁上一貼，這是極簡便的事，極容易作的事吧？但是由南京郊外，一直上行，到武穴附近爲止，就覺得各處城鎮鄉村對於此舉，並不熱烈，而且也極端外行。偶然在人家牆上發現風雨不會侵蝕完畢的紙條，上面行書帶草，寫着這一類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在寫標語的先生，以爲這已經夠通俗。可是我常常問老百姓，什麼叫帝國主義？他們茫然不知所對。就是

男女老幼，爲什麼要一齊抗戰，最後勝利，屬於我們，對老百姓又怎樣？憑什麼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也一切茫然。這我已覺得苦悶了。還有某縣的抗敵後援會，不知那裏弄來的許多錢，把標語美術化起來。作了許多藍底白字的小銅牌子，沿公路村鎮，在人家牆上釘起來。外路人看了，透着貴會辦事。可是，那標語對於民衆的印象呢？更是一個加大的？因爲那藍牌上印的那筆粗字，又與字相稱，太高雅了。最普通的一類，是：「臥薪嘗胆，誓復此仇。」「有敵無我，有我無敵。」「要學古人毀家紓難，購買救國公債。」「人民服兵役是最光榮的事」。像這樣文詞高深，字面，無論老百姓懂與不懂。就算鄉下莊稼人全都明白勾踐下式這一套典故，然而這些句子，有那一個字能，就可引起他的共鳴。現在是連讓老百姓能明白這一點也辦不到，如何引起他的共鳴呢？

(二)壁報 一向讓老百姓睡在鼓裏過日子。有一天要用他了，就把他們集合起來。他們莫明其妙的集合，莫明其妙地受着指揮，這種民力，是行尸走肉，生氣毫無，有什麼用？所以抗戰的消息，必須要常常讓老百姓知道。每一個村莊或市鎮，要有一分報在那裏傳遞，在中國現代的社會，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抗敵後援會，民衆教育館一類的機關，知道了這一點。在一個有文化機關點綴所在，也就有了壁報。沒有這玩意，索興讓老百姓睡在鼓裏，也就完了。既有了這玩意，就應該弄得像樣

一點。可是壁報之有無，就完全看主辦先生的高興與否。以縣鎮而言，有時在十字街頭，在城門洞裏，三五天可以看到一張抄寫的壁報，貼在那裏，假使主辦的先生另有公幹，也許一個星期，也不張貼一次。這是不但無益，而又害之。記得蘇嘉路完全失陷以後，我在某縣的城門洞裏，還看到蘇州河國軍告捷的壁報，原來是十天以前張貼的了。鄉村裏是根本沒有壁報，沿公路的小村鎮，偶然有的，那時間至少是半月以上一次。這老百姓莫明其妙總以為中國在打勝仗。這樣讓老百姓昧於利害，實在是不妥之至。

(三)廣播 無線電收音機，在鄉村大概是沒有的。但每個縣城，縣政府是有一具的。我想，每個縣政府預備下一具收音機，每月花幾十元乾電池的費用，決不是光爲了向縣太爺報告消息。預備萬一之時，好定下三十六計的一計。在收音機裏得來的消息，應該公之民衆。這不但讓民衆可以得到最近的消息。而對於中央廣播的效力，間接的送到民間去，也算地方官長對中央盡了一分承上起下的責任，而實在也是必要的。這代爲廣播的手續，也很簡單。(一)在縣政府裏派兩個人出來，專門記錄收到的消息，謄上油印機，印出若干分，分送四鄉去張貼。(二)在縣城熱鬧街上，分裝幾個放音的喇叭管，(縣城不會很大，裝設容易)同時廣播出去，可是由我親眼所看到的，沒有那一位縣太爺肯這樣做。甚至民衆教育館，幾天沒接到省城報紙，想寫壁報，沒有材料，縣政府也不供給消息。此非不能也，是不爲也。還談什麼宣傳？

(四)演講 光用文字宣傳，在中國社會裏，決計是不夠。尤其是鄉村，農民的識字百分比，低得可憐，再把宣傳文字寫得通俗些，沒有人念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知道。於是到民間去

的宣傳，不能不改到用口。但是，在大都會裏的街頭演講，也很不容易看見，內地縣鎮和鄉村，那裏會有這樣的事呢？我內地有三個月，對民衆演講的事，一共只遇到兩次半。一次省立一中學生，下鄉演講；一次就是我自己扶病在縣城演講；還有半次，却是在路上遇到省大的學生軍，站在一個鄉村鎮中心喊口號帶唱歌，這不是完全對民衆敘述抗日意義的，所以只能算半次。我那縣分，距省城不過百里，口頭宣傳的事，如此之少，再向內地去些，那情形可想而知了。演講在大城市裏，若不是是一個名人出場，說話過了三十分鐘，就有人打瞌睡了。然而在內地，隨便一種演講，都會引得好多人來聽。這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們少見這個，爲了好奇心，他要聽個所以然。等到聽衆願意聽個所以然，這不是演講人最好的宣傳機會嗎？可惜避飛機下鄉的知識分子不少，沒有人肯這樣幹。同時，也是每縣的抗敵機關，只是門口懸一塊招牌，敷衍上司，他們並不來推動。真要推動，任何一個下鄉的知識分子，是不好意思拒絕的。

(五)圖畫戲劇 這兩項事件，是在內地宣傳，絕對可以收效的東西。爲了人才的缺乏，演劇，簡直沒有這一回事。在漢口，在上海，看到許多許多的劇團名字登在報上。可是其次一等的碼頭，如九江蕪湖之類，劇人去的就很少。原因是物質享用不夠。小縣城，小鄉鎮，那是決對不去的。許多戲劇家，整天的喊着抗戰戲劇，那是騙人的，他們只圖着在漢口重慶一類的所出，好賣一元錢的一張票。就算他們在大都市裏出演，也是宣傳。我敢說能花一元錢來聽戲的人，也無待於宣傳。其實他們要說爲職業爲飯碗而演劇，我們倒是很同情的。其次，圖畫，和戲劇犯了一樣的毛病。書攤子上，一角錢一冊的畫報，是知識分子買去作欣賞品的。小縣分沒有，鄉村更沒有。而老

百姓也買不起。儘管全國漫畫家一致動員，作品成千成萬，與老百姓何干？買得起一角錢一冊畫報的人，他們的抗戰意識，似乎也不待這些漫畫來喚醒才有。相反的，鄉村真需要戲劇和圖畫去宣傳。在五年前，我親眼看到學生在縣城演話劇，孔雀東南飛，將一個惡婆婆的行爲改善了，此其一。而連環圖畫這一類的書，偶然有兩本傳到鄉人手上，必張借李借，看爛了爲止。此其二。可是誰能讓這些坐在天鵝絨氈子上的藝人下鄉去呢？隨便舉出這些可以宣傳的事情，都沒有利用到鄉村與內地去，而內地人不是直接感到寇軍的壓迫，怎麼會起來抗敵？當我軍在京滬路潰退下來的時候，南京已是十二分危急，而離南京只有半日汽車路程的皖南各縣，還是大批的香班子，打着旗

抗敵新聞及新聞標題

張友鸞

幟，敲着鑼鼓朝華山。且不談他們不知國事。那時，敵機在蘇皖之間，每日不斷的轟炸，這種香班子大有遭空襲的可能，而他們却愚蠢得不知道。朝香，是鄉間秋收登場，農人慶幸升平的一種舉動。他自己覺得今年不錯，應當感謝菩薩所以朝香。你看！在面前不遠的國都，已在朝不待夕的危急之秋，鄉下人還以爲今年不錯。這民衆麻木到什麼程度？這就是不會把國事去向人民宣傳呀！

以往的事情是如此，現在不見有什麼進步。接近戰區所在，情形是如此。在後方，在後方的後方，又何須說：然則現在喊要到民間去宣傳，還不是應當的嗎？誠然：這是抗敵的初步工作，而抗敵的初步工作，還沒有做到，奈何奈何！

此時是一切都沒有忌礙了，不會因爲「侮辱天皇」的罪名而有封閉報館的危險，沒有大使來提出嚴重抗議，我們可以盡我們所知的報道新聞，我們可以盡我們技巧去標一些使讀者愛看的新聞題目。茅盾先生他在上海有一種感想，覺得各地報紙能用「倭寇」等字樣實在痛快，在上海就深恨看不到這種字樣。請看「孤島見聞一文」然而我們使用一個「寇」字，是不是盡了我們所能夠貢獻的編輯技巧與責任？這個「寇」字，固然表現了我們的情緒，表現了敵人的獸行，老實說來，也只是一種怒罵而已，這不但不能算使用了我們能夠做到的技巧，而且在責任上還差得遠哩。

我們的一切意見，是應該在「論評」上去發揮，根據新聞學的原理來說，新聞的本身以及新聞的標題，都不應含有批評的

意味，以免左右讀者的思想。——這是一句廢話，在這大時代中，一條新聞刊載以後，除了報道而外，我們應當使這一條新聞發生兩種作用，一種是如何激起讀者的抗戰情緒，一種是如何鼓勵起讀者真實出力出錢。因爲如此，我們不怕突破新聞學的原則，我們要在新聞以及標題上來點「夾敘夾議」。

新聞的「夾敘夾議」應當注意的是不許所「議」的超過所「敘」的。標題當然也是如此，却不妨稍稍靈活一點，刺激一點。這靈活與刺激可並不是漫罵，譬如前兩日自流井有一家新運日報，他紀載敵人在南京屠殺了我們五百同胞，於是給來一個標題做「寇又一獸行殺其祖宗」，這完全是暴露一個阿Q的面目，而非我們所需要的標題。

還有，「倭」字與「寇」字，在我個人的私意是應該有點分別

。我們對「日本」稱之為「倭」，我們對「日軍」稱之為「寇」。稱日本為倭，為倭賊，這在歷史中常見的。至於「寇」，那是「武裝的倭」。再說得明白一點，倭人自安生理，只是倭人而已；那設計侵略中國的，那到中國侵略的，才是「倭寇」。舉個例：「倭商業不振」，「寇昨竄晉南」，這不有顯然的分別嗎？我個人一直是這樣分別來編新聞，然而這是小事一段，并不強人苟同，（「寇軍」兩字連用，那却萬萬不可。）

新聞編者誰能夠真像董狐一字不苟？一張新聞紙也決不能

做成「春秋」那樣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貶。然而，「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何況此時編者對國家民族負有重大責任，不能說有了新聞就算盡責，不能說有了評論新聞標題上就不許含批評意味。一條新聞標題的力量，有時或竟能超過一篇論文。一字一句在新聞標題上我們要把它弄好。最應注意的，刺激讀者不是使讀者付諸一笑，付諸一笑的新聞標題在此時是沒有什麼用的。

雜誌名稱	主編者	刊期	每冊定價	半年價	全年價
時事月報	時事月報社	半月刊	〇・二	一・五	二・八
青年月刊	青年月刊社	月刊	〇・〇	〇・六	一・〇
民意	民意周刊社	週刊	〇・五	一・〇	二・〇
中華論壇	中國國際聯盟志會	週刊	〇・二	四・八	八・〇
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	季刊	〇・五		〇・五
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社	季刊	〇・二		〇・七
教育通訊	教育通訊週刊社	週刊	〇・三	〇・七	一・三
戰時經濟	戰時經濟月刊社	月刊	〇・二	〇・六	一・〇
世界政治	中國國際聯盟志會	半月刊	〇・一	一・〇	一・〇
抗戰與文化	抗戰與文化社	半月刊	〇・五	〇・五	一・〇
生力	生力週刊社	週刊	〇・四	〇・九	一・八
文化消息	文化消息社	旬刊	〇・三	〇・五	〇・八
婦女文化	婦女文化社	半月刊	〇・五	〇・六	一・〇
政論	政論社	旬刊	〇・四	〇・七	一・三
民心	民心旬刊社	旬刊	〇・四	〇・九	一・八

總批發及定閱處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社會寫真

閒話長沙 少青

長沙是一個比較好的地方。一般女人都識字，當然也有不識內地都市。到過長沙的人，不過中上級社會識字的女人比較的多，不知留意沒有。各地市，總是滿坑滿谷，攔樓不堪窮人。長沙窮人，都個個衣裳楚楚。就是乞丐，也彷彿受了新生活的洗禮。衣冠雖然不大好，可是總是整整齊齊，清潔潔。

傷兵，有一個時候，很兇。街上橫衝直撞。有些冒充傷兵，無聊份子，更可以隨便人民住宅，借坡窩，還是文明舉動。闊太太，小姐更是聽說傷兵即頭痛。

東戰場統帥張文日將軍到長沙後，一道命令，把傷兵處理得妥妥當當，街上向傷兵，個個都彬彬有禮。說也奇怪，黃浦江上的威風，究竟是不同凡響。

民氣，湖南的民氣，素來發揚。抗戰以來，一般大眾，均在怒吼。青年學生參加訓練更是踴躍。省政府和省黨部也都能盡領導任務。因此，各方面空氣都非常緊張。

女人，長沙的女人，也有些可以陳述

長沙是一個比較好的地方。一般女人都識字，當然也有不識內地都市。到過長沙的人，不過中上級社會識字的女人比較的多，不知留意沒有。各地市，總是滿坑滿谷，攔樓不堪窮人。長沙窮人，都個個衣裳楚楚。就是乞丐，也彷彿受了新生活的洗禮。衣冠雖然不大好，可是總是整整齊齊，清潔潔。

傷兵，有一個時候，很兇。街上橫衝直撞。有些冒充傷兵，無聊份子，更可以隨便人民住宅，借坡窩，還是文明舉動。闊太太，小姐更是聽說傷兵即頭痛。

東戰場統帥張文日將軍到長沙後，一道命令，把傷兵處理得妥妥當當，街上向傷兵，個個都彬彬有禮。說也奇怪，黃浦江上的威風，究竟是不同凡響。

民氣，湖南的民氣，素來發揚。抗戰以來，一般大眾，均在怒吼。青年學生參加訓練更是踴躍。省政府和省黨部也都能盡領導任務。因此，各方面空氣都非常緊張。

女人，長沙的女人，也有些可以陳述

車夫走得太慢，每每催他快走，他不僅不接你這過要求。有時，他還提出嚴重的抗議，甚至把車子放下來，說：『先生要快，何不坐汽車！』再不客氣一點，還說：『我坐上，你來跑跑看！』這些不客氣的態度，我們不想去獎勵，可是他們不做牛馬的精神，却不能不令人佩服。

飲食方面，也和衣服一樣，特別好菜，樣式新穎，不大多見，而真真實實的主食，你覺得以湖南館子做得最好。奇珍閣，玉樓東都可以，三和也不壞。四川館子的平民食堂，價錢雖不平民化，味道却有些平民化。李合盛牛肉，比馬祥興來得更好，價目實在公道。四五個人，兩三元喫得很滿意。聽說，某院長到湘，曾到那里喫過一百元一棹的全牛席。真的不知道如何喫法。譚畏公，真是喫菜大王，到處有他的遺愛。三和的長豆腐，幾元錢一碗，有些嚇人。

最後來一句壞的。天心閣下的防空壕，聽說有青年男女以此為幽會之所。這不免有點令人有『太那個』的感想。

謝冰瑩主編新民報的『血潮』，臨走像一個戰時的四川，沉悶得令人難過。其

四川的沉悶與怒吼

少青

謝冰瑩主編新民報的『血潮』，臨走像一個戰時的四川，沉悶得令人難過。其時候，還向四川人放一砲，說，四川不實，我看，四川有沉悶的空氣，可是同時

也有人在怒吼。

我住在嘉陵江和長江交流的地方。萬里奔放的揚子和險峻葱秀的嘉陵互相結合之處，當然是一副好風景之所在。每天晨光曦微的時候，必定先有集合號，再有口令聲，再次則有武裝民衆不斷的壯烈的吼聲。一般人士，那個時候，都正在做夢。忍心說，四川全部是沉悶的嗎？

一到鬧市，酒肆的生意好得很，汽車特別跑得快。還有一輛汽車，特別放出『多內米』的音調，當然以爲『立異以爲高』，可以大出風頭了。旅館中間，娼妓之多，甲於天下。尤其是一般人的抽大烟。抬轎子的苦力，聽說有百分之七十的煙民。袁世凱說：『僅抽大烟，不失爲良民』。人民真是善良，但是如此窮苦，如何得了。又叫有前進思想的人們，怎不感到沉悶！

重慶的新聞界，近來非常活躍。原有的國民公報，新蜀報，內容都很好。近來更是緊張。新民報當然是競爭中的主力。主持人陳紹德十分靈活。除南京原有的人格外，還拉了張友鸞主編，張恨水編副刊『最後關頭』。謝冰瑩編副刊『血潮』；（最近走後，改請沈起予）而且謝女士還發表長篇『從軍日記』。社論還是由羅承烈担任，號召力自然不小。上述諸人除謝沈

之外，都是陳之十多年乃至廿年的老友，大家都只支一點夫馬費。因此，新民報容納這麼多的人才，而經濟上還能支持下去。近來營業發達，銷數已經到了第一位。廣告方面收入也很好。

上海時事新報已租好房屋，五月一日左右可以出版，大公報也想在重慶出地方版。人民日報也正在裝機器，改良印刷，而且找了專人作社論。三月十四日起又加出『人民周報』，內容大有可觀。大張旗鼓，改革擴充是一個可注意的事態。漢口掃蕩報必要時還想搬來，因此，重慶將成爲最重要的新聞紙區域。

雜誌界，並不十分活躍。成都有『統一評論』，爲張雲伏所主編。重慶有『現代讀物』，高顯鑑主持。兩個刊物都很好。上述『人民周報』，或者將成爲最有新態態的刊物，因爲剛剛出版，還不敢作肯定的批判。

文化團體，有名的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中蘇文化協會都搬到了四川。正在各整旗鼓，大事活動。文化支社也很起勁，街頭看見他們粉筆寫的標語很多。

『天府』，究竟不同，物產真是富豐，價格非常低廉。好過美國橘子的『廣柑』，價錢最便宜的時候，一元錢可以買到百

二三十個。出產的地方聽說一元錢可買六百個。普通橘柑，三角錢一百，味道甚好。近來貴了些，但是比較美國橘子一元六七個真有天淵之別。而且奇怪得很，廣柑的色、香、味都比美國橘子好，祇是多兩顆子兒罷了。此外日用必需之品都應有盡有。米也不貴，十多元一市石。所傳四五元一石，是指舊石而言，每石快到市石三石之多。藥材非常便宜，一角錢一付的藥都不多見，普通總是三五分六八分錢一付。此地國幣應該很發達了，房租也很『香因』（四川話，便宜的意思。）新房子普通兩三元一間。非大洋房，並不貴。普通房子建築費很便宜。林主席打算在歌樂山建私邸，有房十七間，只要千元多。如果築所新式小住宅，每宅五間，三大兩小，祇需四百元。真算香因之至。不過，買洋貨，却貴得很，這一點，真使四川夠得上稱爲民族復興之地。

還有一點，值得說說。即是四川土地都是高低不平。都市中間，有的房子三層樓與馬路平行。一進門上一層即到了四層樓了。出門走路。除開馬路之外，總是像上『中山陵』，石級非常之多，梁任公說，倫敦霧非常之多，人的身體總感到重壓，所以英人不能不好戶外運動。重慶多霧

，出門上上下下階級，也許就是戶外運動的替代。鄉下大眾，利用土地，比那省的人人都勤勞，無論為斜坡，為山嶺，寸土尺地，都有種植，決無荒廢，當然，這是川東狀況，西北一帶，土地荒廢，所以省政府正在督促墾荒。最高的地價也不過四角錢一畝，低的每畝一角錢。墾荒的人們，都有種植，決無荒廢，當然，這是川東狀況，西北一帶，土地荒廢，所以省政府正在督促墾荒。最高的地價也不過四角錢一畝，低的每畝一角錢。墾荒的人們，

戰時氣氛中的武漢

丹巴

武漢，最近可以說是抗戰的最主要的地方。重慶軍政人物，都駐在此地。而倭寇的中原大會也以此為目標。如果你罵他們該死，實在饒恕了他們。國難時候，趁火打劫，一死就足以當其罪

不用說，武漢各方面是在怒吼之中。武漢的報紙，自十五六年『中山日報』時代以後，進步很快，掃蕩報早已突破四萬份，為華中惟一大報。也彷彿是鐵核子，武漢日報也很好，銷數自然並不很壞。

淪陷後的上海素描

王玉

刊物，不是以武漢為根據地呢！上海自我國軍隊退出以後，可以說成

可惡的，第一等是法租界的房東，第二等是狡猾的商人。法租界的房價每間已漲五六百元一月，而且要先交三個月四個月。他們還幻想天開，一房堂屋，隔層板子，上下成了兩層。一間茅房，半間廚房，也都成爲上等房子。真的，可惡到每一個住法租界的人，願意日本飛機炸平，

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換得對於房東的報復。南市，龍華，新市區更不用說，滿目淒涼，那里不是戰後劫痕。偶然有一二沒高拾價格，一天之間，可以漲一倍以上。有燒燬的地方，也不過是斷瓦頽垣，不堪

『皇軍』殘忍，是世界上沒有的！以前看見同胞，無一不是他的仇人。尤其是壯丁和婦女，婦女不論年老與否，無一倖免淫國軍人的蹂躪。壯丁，殺，當然是殺。可是他們用盡種種的方法去虐殺。有的破腸破肚，還輾轉呻吟。有的令其先自掘一洞，再行跪在洞邊，一槍打去，自然自

子的新聞報，申報，自然什麼也說不上了。申報移香港出版，大約不久可成事實。時事新報不久會在重慶與讀者相見。短小精幹的立報，早已停刊。可是日本鬼子仍然放他不過，早不久還放過一次炸彈。小報也同一命運。時代日報，由劉叔模，胡秋原接辦移到了漢口出版。上海大公報也到了漢口。聽說他又到香港，到重慶出版的消息。

娛樂場所，跳舞場雖然還很多，彷彿不知人間有此事，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照樣開着，可是到底生意不大對勁，也是『外強中乾。』

物價，近來好一點，以前曾貴得可憐，舊歷年時候，米，四五十元一石，一隻雞，賣到五六元。而且漲的都是一些人需要的日用品，奢侈品和一般貴族用品，有。反價格低落。因此，涼血，關人們，倒也舒服。有。關人，特別由香港跑到上海來過年。更有些人由內地轉香港到上海來討舒服。舒服，只要你稍有人心，看，聽，莫不亡國景象，那里談得舒服。

還有一件痛心的事。即是漢替敵人的登記事業。青年學生，教員，公務員，都在歡迎之列。但是聽說日本人曾經把

一批登記的人秘密處死。近來想做漢奸的人也少了些。

上海，本來是一個壞地方，此刻更不是人住的世界！

文藝情報

由藝文社寫到文陣

王吉文

周佛海，陶希聖兩位，最近在武漢發起『新文社。』規模很大，人才也非常之多。聽說內中分社務和設計兩部。前者為周負責，後者由陶負責。各任一部的總幹事。內分各組，內中人物

有羅君強，劉伯蘭，易君左諸氏。大家都知道周先生自從寫了三民主義理論之體系以後，是三民主義心理學家，而陶先生

的文章滿天下，日本人的譯本都非常之多。近年來，因為抗日陣線展開，言論自由，各方面理論，因此不一致，陶先生一方面本其學者之權威，一方面拿出老百姓說老實話的態度。毫不客氣的站在抗敵論壇前線，以一個嚴厲姿態出現在

是一位抗敵文化動員的前鋒，表現的成績，着實不少。此刻組織藝文社，我們雖然還不十分明白內容，但是必然的含有偉大的貢獻，這是我們可以預期的。聽說，他們還要在各地成立分會，陣線的展開，可以說是抗日以來，文化界上一件大事。

『創導』是一本主要刊物，自二卷一期以來，即已大行更新，內容非常充實。最近由劉心斯氏接辦，內容十分緊張，文章亦極豐富，是本報所希望之刊物。劉炳黎氏主編『前進』，早已中外注意。去年羅敦偉氏在『民族第一主義』及『新血』之文章，引起自本論壇上極度注意。外交時報會專文批評，認為乃『南京政府』之第二期統一基本動向，樂羅為『南京政府』用理論家，可見該誌的國際地位。刻下在武昌繼續出版，內容很好。

矛盾，沈雁冰先生自發表『孤島見聞』後已引起社會對於這位文壇健將的注意。聽說他已經到了香港，居處也很安全，還定出版『文陣』半月刊，在廣州印刷，每期親自到廣州看人樣，內容當然不會十分含糊。除刊載文藝作品外，還預準多搜集各地文壇情報。

時事月報抗戰半月刊

第六卷第六期已出版每册一角五分
第一元五角全年二元二角止中書局發行

投 稿 簡 章

- 一、凡關於中國及世界社會問題之論文或譯述，均所歡迎。
- 二、文體不拘，須加新式標點，稿件務須繕寫清楚，翻譯請附原文。
- 三、稿件最好用真實姓名，用筆名者，務請注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信。
- 四、稿件揭載後每篇致酬（一）本雜誌。（二）現金。
- 五、稿件概不退還，如欲退還須先聲明並附足寄還郵票。
- 六、通訊處：重慶千廝門順城街二十一號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

廣 告 價 目 表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甲	乙			
甲	底封面外面	封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首面首篇之對面	九十元	六十元	三十元
乙	首篇以外正首面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丙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詳細廣告定章，函索即寄。

不 許 轉 載

中 國 社 會 第 四 卷 第 三 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 輯 者 兼 出 版 者

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

發 行 者

重慶售珠市·昆明萃山南路
正 中 書 局

批 發 定 閱 處

武昌胡林翼路·長沙府正街
漢口花樓街十四六號
正 中 書 局 雜 誌 推 廣 所
電 話 二 四 一 〇 六 號

代 定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定 價 表

訂 購 辦 法	冊 數	價 目		郵 費
		國 內 及 日 本	香 港 廈 門 國 外	
零售	一	一角五分	二分	八分
全年預定	四	五角	免	三角二分
全年預定	四	五角	免	八角

每季一冊 全年四冊 每季首月十五日出版

特大號書價另定預定不加本國郵票二角以下通用惟當地限制貼用之郵票一律不收

定閱諸君如有更改地址請將姓名地址及定單號碼逕向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接洽

中國國民黨宣言

分五角三

一 寄掛
一 寄掛
一 寄掛

中國國民黨之有宣言，始於檀香山與中會之成立，以迄去年舉行之五屆三中全會，其間歷時蓋四十有四年。其計宣言凡六十四篇。故諸宣言之內容，大都盱衡當時之國家形勢，揭發中國國民黨救國匡時之主張。今欲體認中國國民革命之行程，當溯國家處境之真象，與夫個人修德立業之道，對於中國國民黨歷次發表之宣言，不能不有深切之研索。在此抗戰期間，此宣言集為吾人必讀之典籍。（廿七年四月出版）

新華日報叢書

在全面抗戰的展開聲中，本社為闡揚抗戰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提供非常時期青年民衆讀物及各地從事訓練工作人員應用起見，特於最近期內出版戰時綜合叢書第一輯二十種，書目如下。已有價目者均經出版，其餘均于日內陸續出書。

健黨與建國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第二期抗戰	論游擊戰	領袖抗戰言論集	抗戰文獻	民族至上論	民主政治論	抗戰與國防經濟	我們的外蒙古	抗戰與落中之日本	青年往何處去	抗日名將錄	統一與抗戰	抗戰與生產	抗戰與教育	戰時教育問題	民衆動員問題	日寇燃犀錄
.....
.....
.....
.....

發行部

漢口後街樓六十六號

獨立出版社

(各地業同批購辦法特別優待)